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從議程設定論國際經貿規範之法制化：以「市場擾亂」概念的發展與演化為例

Market Disrup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Processes of
Legalization: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enda-Setting

doi:10.30390/ISC.200707_46(3).0003

問題與研究, 46(3), 2007

Issues & Studies, 46(3), 2007

作者/Author：曾雅真(Yea-Jen Tseng)

頁數/Page：85-12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7/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707_46\(3\).0003](http://dx.doi.org/10.30390/ISC.200707_46(3).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從議程設定論國際經貿規範之法制化： 以「市場擾亂」概念的發展與演化為例^{*}

曾 雅 真

(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 要

討論國際經貿規範的法制化過程，無法規避國際法與國家間的權力運作問題，更不能忽視國際社會不存在最高權威之國際無政府狀態的事實。國際社會存在國家資源暨地位的不對稱差異，使強權得以操縱國際經貿議程，建構符合強權利益的國際經貿規範。形式上，國際經貿規範的法制化，係參與者基於對等地位，透過雙邊暨多邊談判後所建構而成的法律，但其實質內容，仍反映強權國家在不對等的基礎上，操縱談判議程，鑲嵌強權利益，扭曲平等正義，強化本國優勢，限制對手經貿發展機會之事實。

觀察國際經貿法中「市場擾亂」概念的法制化過程發現，強權通常透過「內生模式」的議程設定手段，在國際制度中植入符合強權利益的規範概念，並透過國際制度之正當程序，法制化該等利於強權的國際經貿概念。是項國際經貿規則，在程序上未必違反國際制度，但實質內涵，卻不必然切合國際制度的精神與宗旨。而當該等國際經貿概念面臨更迭甚或終止時，強權國家仍可藉議程設定手段，將之植入另一項國際制度，繼續運用於特定領域或特定國家，維繫並保障強權之特定利益。

關鍵詞：市場擾亂、國際經貿法、議程設定、世貿組織、國際制度、法制化

* * *

壹、前 言

國際經貿活動的蓬勃發展，致使國際間建立國際經貿規範的需求日益高漲，國際

* 作者在此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的審查意見，他們的寶貴指正與鼓勵，益發增添了本文的學術價值。

經貿法之相關規範自然日趨緊密與多元化。舉凡國際雙邊或多邊經濟暨貿易協議、國際經濟暨貿易組織下的各項協議，乃至於具「軟性法」(Soft Law)特質之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1947)，^①皆係構成今日國際經貿法的法源。^②在近五十年的國際經貿法發展過程中，曾浮現出一些新的概念與制度，雖然豐富了國際經貿法的內容，但是亦為國際經貿法的發展，帶來新的課題與挑戰。

作為國際經貿規範創設法源之一，世貿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所創建的國際經貿規範，是國際社會治理國際經貿活動所設立的重大里程碑。在自由貿易精神下，國家或區域集團透過多邊國際經貿協定的締結，創建國際經貿制度，並法治化 (legalize) 該等制度之內涵。世貿組織與世貿協定 (WTO Agreements) 的運作與實踐，雖然拓展並豐富了國際經貿法的內容與範疇，但世貿組織的實踐，亦為國際經貿法的發展，帶來新的挑戰。

自 2002 年加入世貿組織後，國內學界之國際經貿法研究多以世貿組織為研究範疇，鮮有自國際議程設定 (Agenda-Setting) 角度宏觀國際經貿法之討論，對於國際經貿規範之法制化過程亦不多著墨。目前國內探討世貿組織之論著，多集中於兩個方

註① 關於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GATT 1947) 規範本身 (per se) 是否具有拘束力一問，明定在世貿組織 (WTO) 設立協定第 16 條第 (1) 項，該款將 GATT 架構下的所有規範、決議、程序暨實踐慣例設定為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Guidance”。著名國際法學者如 John H. Jackson 以及 Hilf Meinhard 等人即因此認為，GATT 1947 拘束力之始源，乃係源自締約國的「實踐慣例」(customary practice)。其次，就國際法觀點言之，GATT 1947 之生效，並非源自 GATT 1947 之法律規範本身，而是透過 GATT 1947 「暫時適用議定書」(Protocol of Provisional Application, PPA)。透過 PPA 生效的 GATT 1947，僅係一“Soft Law”，不全然具有「國際條約必須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 之“Hard Law”的法律特質。如 GATT 暫時適用議定書第一段，即明定有「祖父條款」(grandfather clause)，承認締約國內國法的法律效力優於 GATT 1947。又如 GATT 之爭端報告裁決報告必須包含有敗訴國在內之全體合意 (consensus) 始生效力的規定，實則是授與締約國是否接受拘束的選擇權。就此觀點，GATT 1947 拘束力之始源，並非來自 GATT 1947 的規範本身，而在於締約國是否選擇合意的「後續實踐」(subsequent practice)。請參閱：John H. Jackso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2), pp. 31~59；Hilf Meinhard, “Power, Rules and Principles-Which Orientation for WTO/GATT La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4, No. 1 (2001), pp. 123~124; Frederic L. Kirgis, Jr., “Specialized Law-making Process,” in Oscar Schachter and Christopher C. Joyner(eds.), *United Nations Legal Ord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47~154; Peters C. Mavroidis,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A Commenta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7；Oscar Schachter, “The Twilight Existence of Nonbonding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1, No. 2 (1977), pp. 296~304; Robert E. Hudec, “GATT or GABB?-The Future Design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 80, No. 7 (1971), pp. 1299~1386.

註② 本文所謂的「國際經貿法」一詞，指的是涉及跨國經濟暨貿易活動之國際規範。國際著名學者傑克森 (John H. Jackson) 認為，涉及國際貿易規範的國際法，是目前國際經濟法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的核心規則。廣義的國際經濟法涵蓋了所有涉及國際經濟事務的國際法，實過於籠統，因為幾乎所有的國際關係皆會觸及廣泛的經濟問題，所以傑克森主張狹義解釋，認為國際經濟法涵括跨國境的交易、投資與服務等面向，不但與境外的個人與公司在一國境內之經濟活動有關，並涉及國與國之間的國際經濟關係；其中，在國際貿易方面，無論是貨品貿易或是服務貿易，皆係國際經濟法的規範核心。請參見 John H. Jackso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p. 25.

向：國際政治學者或者從國際制度的角度出發，^③討論全球經貿制度的政經效果與全球經貿合作的影響，或者從世貿規範的內容著手，討論全球或區域市場之經貿福祉與利益分配問題；法律學者則多將研究重點集中於世貿協定法條內容之解析，或探討世貿會員之國內法如何依據世貿規範調整的問題。^④

研究國際經貿規範之法制化過程，探索強權 (great powers) 如何建構並制度化有利於強權利益的國際經貿規範，將有助於觀察未來國際經貿規範法制化之發展趨勢，並藉此開展我國世貿組織研究的新視野。又以權力運作在國際經貿規範法制化過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與作用，了解國際法與國際權力之運作關係，將有助於剖析國際經貿規範之法制化過程。本文遂認為有必要從議程設定作為一種權力運作的角度，探討某項國際經貿規範如何在權力作用下浮現，以及該等規範如何藉法制化 (legalization) 途徑，成為國際經貿協議內容，進而對國際成員產生拘束力。

為此，本文首將解析國際法與國際權力之運作關係，次從議程設定角度，探索強權如何建構並制度化有利於強權利益的國際經貿規範，^⑤約束他國，最後再以國際經貿「市場擾亂」概念之法制化過程，對照檢驗強權國家如何透過議程設定，主導國際經貿規則之建構。

貳、國際法與國際權力運作

國際社會內的國際法對國家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此點從國際法的運用層面即可窺知。首先，條約是國家處理國際社會各項事務（如貿易、財政、投資、安全、犯罪、文化、科學、教育等）不可或缺的工具。其次，當國家間擬針對某重大事項進行承諾時，通常會透過條約締結方式表達該等承諾，如在戰爭結束後重建國際秩序的關鍵時刻。第三，包括重要強權國家在內的多數國家，皆設有條約專責單位或法律諮詢機構，並任命一定數額的得力官員主司其事。第四，在面臨重大事件時，國家通常會考量到國際法的正當性問題。^⑥足見國家對於國際法的重視程度。

註③ 國際關係之新自由制度理論宗師基歐漢定義國際制度為：一組持續及互相連接的正式或非正式規則。請參考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9), p. 163. 但是基歐漢沒有討論國際制度的相互關係及國際制度間的上下層級關係。

註④ 以台灣 TSSCI 經濟、法律、政治暨綜合類期刊 2000 年至 2006 年 9 月作為檢索樣本，並以題目涉及世貿規範者作為統計指標，發現經濟學門期刊尚無相關文章發表，法律學門、政治學門暨綜合學門期刊計有 40 篇，作者按筆劃順序排列，包括：牛惠之、江啓臣、李貴英、沈木珠、卓慧苑、周旭華、林江峰、林彩瑜、邵宗海、施文真、洪德欽、倪貴榮、徐揮彥、張五岳、張依依、張南薰、張新平、陳伯志、彭心儀、曾雅真、葉順榮、蔡宏明、蘇宏達等。

註⑤ 強權可界定為人口、領土、工業資源、社會組織及歷史傳統上相對其他國家強大，並且具備全球性普遍利益的國家。請參考 Martin Wight, *Power Politics*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78), pp. 48~50.

註⑥ Onuma Yasuaki (大沼保昭), "International Law in and with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Func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4, No. 1 (2003), pp. 124~126.

然而，討論國際經貿法的內容與實踐，無法規避國際法之法制化過程與國家的權力運作問題。國際經貿活動的蓬勃發展，致使國際間國際經貿規範的建立日趨多元化，舉凡國際雙邊或多邊經濟暨貿易協議、國際經濟暨貿易組織下的各項協議，皆係構成今日國際經貿法的法源。^⑦而國際經貿規範的建構乃至於國際經貿組織的設立，均為國家間談判的果實，並藉多邊暨雙邊條約的簽署，產生國際法的拘束效果。但討論國際法或是國際經貿規範的內容、運作與實踐時，亦不能忽略一個客觀的事實，即今日的國際社會仍是處於無政府狀態，^⑧所有的國際法，尤其是本文所探討之國際經貿法的概念、內涵與制度運作，均是建立在國家間的合意基礎之上，而不是奠基於目前尚未存在的「世界政府」權威。因此，當國內法學者將國內立法者之間的角力過程歸於政治學的討論範圍，並致力於國內法律條文的解釋與運用時，國際法學界卻必須追本溯源，梳理國際法中特定規則的法制化過程，方能對國際法的規則與運用，提出建設性的學理見解。權力在制定國際法規則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強權對國際法規則的影響，成為國際法論述一項重要並且不能忽視的研究課題。^⑨

美國國際法學界對權力與國際法之間的關係，曾經歷一段研究起伏。二十世紀初葉，美國國際法學者以為透過國際法的推展，國際社會中權力的作用即會與日降低，但該等古典學派思維（classical legal thought）在1930年代法西斯極權國家興起後飽受批評，新興的現實（realist）學派認為，國際法不過是強權國家利益暨國際權力的反映。但對現實主義的反駁也因應而生，美國國際法學者運用自由主義、制度主義、社會學、理性主義等不同觀點，檢視法律如何影響國家、群體與個人的行為。建構主義則從社會建構的角度審視國際法，認為國際法反映並且強化了個體的認同。進入二十一世紀，美國國際法學者不再以單一的視野解析國際法，而是以更具啟發性的方式，

註⑦ 有關國際經貿法法源之論述，請參見請參見 Dominique Carreau, Thiebaut Flory et Patrick Juillard, *Droit International Economique*, 4th edition (Paris: L.G.D.J., 1998); Marco Bronckers and Reinhard Quick, *New Direction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ssays in Honor of John H. Jackson*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

註⑧ 所謂國際無政府狀態，是指在主權國家之上，不存在中央型式（centralized）的最高政治暨法律權威，國家之間互不存在從屬性的層級關係（hierarchy），並且國際社會缺乏強制拘束性質的法律與執行力。於是國際關係理論以為，國際社會是一個結構，而無政府狀態則是該結構的特徵。但國際無政府狀態，並非混亂的同義字，於是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中，秩序（order）仍有存在的可能。有關國際無政府狀態之論點，請參閱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有關國際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與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仍在無政府狀態中運作之論點，請參考 Stephen D. Krasne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16-32。就國際治理（governance）角度討論國際組織與無政府國際結構之論點，請參考 Paul F. Diehl, *The Politic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London: Reinner Publishers, 2005), and Robert O. Keohan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註⑨ Richard H. Steinberg and Jonathan N. Zaslof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0, No.1 (2006), p. 85.

探索權力與國際法之間的關係。^⑩

英國的學者則深入探究法律在國際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且將研究重點置於強權操縱與運用國際法的模式。^⑪鑑於強權所擁有人力、知識、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資源均超越一般國家，故而強權國家在國際法的發展、維繫與變革過程中較一般國家更具影響力，更能將本國的利益轉化為法律的概念。^⑫

在無政府狀態下孕育、生成、運作與發展的國際法，具有特殊的性質與功能。首先，國際法本身具有工具性。國家在國際法內固然被要求依據國際法的期待而作為或不作為，但國家亦可運用國際法的制度與概念，滿足國家的目的，所以國際法亦為國家的工具之一。其次，國家接受國際法作為行為準則的現象證明，國際法具備維持國際現狀的重要功能。如國際法上的條約必須遵守原則（*Pacta sunt servanda*），即曾經形成強權國家透過不平等條約宰制弱勢國家的歷史經驗，於是強權國家與弱勢國家之間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即成為強權維繫國際現狀的一種政治工具。^⑬最後，當強權國家違反國際法時，極少遭到其他國家或是國際組織所施加的反制措施或制裁，致使強權國家在國際法上時常享有例外的奢侈（*exceptional luxury*）。^⑭

換言之，強權國家雖會受到國際法的拘束，但卻較一般國家具備更多的能力，去形塑一個符合本國利益的國際規範，並懂得運用更多的方法與技巧，去削弱或規避國際法的束縛。強權至少有四種強化統治地位的國際法運用策略，分別是工具化（*instrumentalization*）、撤銷（*withdraw*）、重塑（*reshape*），以及國內法替代（*replacement*）等四種方法。^⑮國際法的發展過程中，許多重要的法理概念，均源自強權自身行為的正當化過程，例如領土的先佔（*occupation*）暨有效佔領原則（*effective occupation*），以及條約神聖原則（*sanctity of treaties*）等，均是由不同時代的強權所創造，進而成為國際法的重要內容。^⑯此外，當強權遭遇對其不利的國際法概念或實踐時，即會規避該等國際法義務，或者抗拒以多邊條約形式所創造的國際規範，限縮被

註⑩ 美國學者史坦伯（Richard H. Steinberg）與扎斯洛夫（Jonathan N. Zasloff）回顧美國國際法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創刊一百年來文章的內容，對美國學者探索權力與國際法之間的歷程，有整理性的介紹：請參考 Richard H. Steinberg and Jonathan N. Zaslof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Law,” pp. 64-87.

註⑪ 請參考 Michael Byers, *Custom, Power and the Power of Rul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Michael Byers eds., *The Rol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Michaels Byers and Georg Nolte, eds., *United States Hegemon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註⑫ Michael Byers, *Custom, Power and the Power of Rul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pp. 35-40.

註⑬ 有關不平等條約的討論，請參考 Matthew Craven, “What Happened to Unequal Treaties? the Continuities of Informal Empire,”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4, No. 3/4 (2005), pp. 335-382.

註⑭ Onuma Yasuaki (大沼保昭), “International Law in and with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Func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 119.

註⑮ Nico Krisch, “International Law in Times of Hegemony: Unequal Powe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6, No. 3 (2005), pp. 381-407.

註⑯ *Ibid.*, pp. 382-383.

拘束的效果。例如大英帝國對建立國際海戰公約 (Laws of Naval War of 1909) 的反對立場，以及美國拒絕批准京都議定書 (Kyoto Protocol) 等，均是明顯的例證。^⑰其次，強權亦時常透過雙邊條約形式制定「軟性法」，以建構一個符合強權利益的層級式法律秩序，^⑱並要求對手國遵行該等法律之實質暨程序規範，但本身卻享有不受拘束的特權。^⑲強權國家偏好採用雙邊協議制定「軟性法」的原因，在於該等有限拘束的法律，可以降低強權統治的成本，並得以在法律中置入強權國家的利益；而小國基於利益如降低談判暨交易成本等考量，亦會選擇接受該等規範。^⑳最後，強權常用並且是一般國家所難以仿效的方法，乃是利用其內國法約束對手國暨第三國的行爲，其他國家或者依賴強權的政經資源，或者迫於權威，在無其他選擇下，亦只有被迫接受與遵奉強權的國內法。^㉑

世貿組織成立後，國際法似乎開拓了一塊不受強權操縱影響的淨土。世貿組織是全球經過多邊談判後的果實，^㉒並且逐漸有學者認爲，世貿組織下所發展的國際經濟暨貿易法，正逐步形成國際貿易體系中的憲法 (constitution)。^㉓是項樂觀的願景相信，正在建構中的世貿組織全球經貿憲法，將透過全球經貿的互動，產生去權力化的效果，國家間的政治與權力角力，將不再是決定國際經貿活動的主要因素，而世貿組織作爲一種全球治理的制度，將創造出新的國際經貿規範，主導各國的經貿行爲。^㉔

註⑰ *Ibid.*, pp. 387-388.

註⑱ 有關霸權建立國際法中層級法秩序的論述，請參考 Nico Krisch, "More Equal than the Rest? Hierarchy, Equality and US Predomina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Michaels Byers and Georg Nolte, eds., *United States Hegemon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35-175.

註⑲ Nico Krisch, "International Law in Times of Hegemony: Unequal Powe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p. 399.

註⑳ Kenneth W. Abbott and Duncan Snidal, "Hard and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3 (2000), pp. 448-450.

註㉑ Nico Krisch, "International Law in Times of Hegemony: Unequal Powe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p. 400.

註㉒ 有關關貿總協轉變爲世貿組織的歷程，請參考 John H. Jackson,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pp. 31-78.

註㉓ Deborah Z. Cass, "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Judicial Norm-generation as the Engine of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2, No. 1 (2001), pp. 49-53.

註㉔ 支持世貿組織相關法律與實踐正形成國際經貿憲法的論述，請參考 Ernst-Ulrich Petersmann, "Constitu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Business*, Vol. 17, No. 2/3 (1996), pp. 398-469; Ernst-Ulrich Petersmann, "The WTO Constitution and Human Righ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3, No. 1 (2000), pp. 19-25; Hilf Meinhard, "The Role of National Cour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lations,"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8, No. 2 (1997), pp. 321-356; Joel P. Trachtman,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WTO,"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7, No. 3 (2006), pp. 623-646; Deborah Z. Cass, "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Judicial Norm-generation as the Engine of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pp. 39-75. 支持論者強調自由貿易權利，將貿易與人權問題掛勾，認爲自由貿易乃國民之基本權益。藉由直接民主概念之延伸，主張私人得在內國法院直接援引 WTO 法以對抗不當扭曲 WTO 法的內國法規，一來得以導正各國對 WTO 法的扭曲效果，進一步降低各國政府執意實行保護主義而犧牲私人自由貿易的權利，最終並可藉此提升 WTO 法在各會員境內的法律地位，確保 WTO 法的執行效果，強化 WTO 的生存與發展。

但隨著世貿多哈回合 (Doha Round) 談判的延宕，世貿規則成爲全球貿易憲法的看法與期待，正遭受許多質疑與挑戰。^⑤如憲政主義有不同的類型，而每一種類型皆涉及到分配的問題，當前有關全球經貿憲法的討論，並未觸及世貿屬於何種憲法的分配形式，更未說明在該等憲法類型下，何者有利，何者不利，何者被賦予權力，又何者的權力被剝奪等問題。^⑥事實上，回顧世貿組織發展的歷次談判即得以看見強權運用權力塑造世貿規範的痕跡。^⑦表面上，世貿組織是一個經由多邊談判之討價還價過程所建構的全球經貿制度，世貿規範影響並拘束會員的行爲，更透過共識決策以及爭端解決機制 (WTO Dispute Mechanism) 的運作，強化世貿規則的法制化地位，但檢視世貿規則之實質意涵發現，世貿規則其實是強權透過議程操縱之權力運作，所形塑出的國際經貿法律體系。

叁、議程設定與國際規則的成形

世貿組織下國際經濟暨貿易法的成形，在形式上是參與者基於平等地位，透過雙邊暨多邊談判後所建構的法律規範，但世貿規則在實質上仍反映了強權國家在不平等的基礎上，藉由談判議程的操縱，鑲嵌強權國家利益，扭曲平等與正義，強化本國優勢，限制對手經貿發展機會之事實。

強權國家在建構國際法的概念時，主要是運用「非決策」(non-decision-making) 之政治議程控制 (control over agenda)，^⑧使得企圖改變現有社群利益暨權利關係的需求，在被提出之前即被迫噤聲，或者被隱匿，或是在它們可能被引入相關決策場域前

註^⑤ Jeffrey L. Dunoff, "Constitutional Conceits: The WTO's 'Constitution' and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7, No. 3 (2006), pp. 647-675. 反對世貿組織相關法律與實踐正形成國際經貿憲法的論述，請參考 John H. Jackso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onstitution and Jurisprudence* (Lond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8); John H. Jackson, "The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en Years of the WT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8, Issue 1 (2005), pp. 3-15; Jan P. Kuijper, "The New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The Impact o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 29, No. 6 (1995), pp. 49-71; Jeffrey L. Dunoff, "Constitutional Conceits: The WTO's 'Constitution' and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Law," pp. 647-675. 質疑論者以爲，私人得在國內法院直接援引 WTO 法係一危險的概念。該派論點質疑參與 WTO 談判者的代表性，認爲 WTO 法的談判代表並非完全係經由「直接民主」的選舉方式產生，多係由各國政府所指派，所以 WTO 法是少數菁英意見、在少數國家的主導下所製造的結果，允許私人得在國內法院直接援引 WTO 法對抗國內法律，將致使「非直接民主」方式所產生的法律凌駕國內法之上，致使少數國家之少數利益藉由直接效力的導入，摧毀各國依 WTO 法所應享有的權利。

註^⑥ Jeffrey L. Dunoff, "Constitutional Conceits: The WTO's 'Constitution' and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Law," p. 673.

註^⑦ Richard H. Steinberg, "In the Shadow of Law or Power: Consensus-Based Bargaining and Outcomes in the GATT/W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2 (2002), pp. 339-374.

註^⑧ Steven Lukes, *Power: A Radical View* (New York: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974), p. 21.

就被封殺，或是在政策過程的執行階段中，即遭到失敗、殘缺不全或屍骨無存的下場。²⁹強權可以創造或強化社群中的優勢價值、信念、程序或制度等，將討論範圍，限定在無損於強權的議題上，並使對手國產生苦楚 (grievances)，或者使得對手國的苦楚不會成為決策情境中的議題。³⁰奈伊 (Joseph S. Nye) 在討論「柔性力量」(soft power) 時，定義「柔性權力」是能夠塑造他者希求的能力，亦即某國能夠架構形勢並且操縱政治議程選擇的能力，以致於他國將依循某國之利益，孕育或界定其偏好。³¹不過奈伊並未明確國際政治中議程設定能力的運作策略。

議程乃是被政治系統視為值得正當關切 (legitimate concerns) 的一組政治爭議問題，或是一個被特定之制度決策體所主動與強烈關注的特定事項，³²不宜與國際組織的議事程序 (rules of procedure) 劃上等號。³³議程可以被區分為制度議程 (Institutional agendas) 與體系議程 (systemic agendas)。制度議程是指議題或需求受到政治體系決策團體的注意，不但會被置入研議階段，並且決策團體亦會採取具體的因應作為。³⁴體系議程是被政治體系成員所普遍認知的議題或需求，通常很抽象，並較制度議程的範疇更加廣泛。討論國際體系內議程的關切焦點，乃是某項議題能否被列入國際體系的制度議程，亦即能否被列入國際事務討論暨採取具體行動的項目。³⁵

政治體系內存在的偏差 (biases)，左右了議程設定的影響與管道，使得某些行為者更容易將需求列入政治議程。首先，在一個有限參與的國際政治體系中，國家對於議題的影響力暨管道的分配 (distribution of influence and access) 即內含許多偏差，致使國際體系的運作會有利於某些行為者而不利於其他的行為者。此外，在此等政治組織內，問題的範疇與決策選項是受到限制的，因為所有的組織都存在偏差動員 (mobilization of bias) 的情況。偏差動員是一組佔優勢的價值、儀式暨制度的程序，它們被有系統且持續地操作，在不利他者的情況下，使某些個人或團體得以獲利；這些受益者從中得利，進而取得一個較佳地位，以保障並增進更大的利益。³⁶第三，一項佔優勢的偏差，決定了問題與決策選項如何被視為正當關切的項目，而政治體系的情性，使得該偏差很難被改變。最後，前政治或是前決策 (pre-political or pre-

註²⁹ Peter Bachrach, *Power and Povert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44.

註³⁰ 郭秋永，「對峙的權力觀：行為與結構」，*政治科學論叢*，第20期（2004年），頁39。

註³¹ Joseph S. Nye, *Power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 From Realism to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77;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 7.

註³² Roger W. Cobb and Charles D. Elder, "The Politics of Agenda-Building: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for Modern Democratic Theor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33, No. 4 (1971), pp. 905-906.

註³³ *Ibid.*, p. 905.

註³⁴ *Ibid.*, pp. 905-906.

註³⁵ 國際政治討論議程設定之文獻，請參考 Richard W. Mansbach and John A. Vasquez, *In Search of Theory: A New Paradigm for Glob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87-142; Steven G. Livingston,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Agenda-Setting: Reagan and North-South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No. 36, No. 3 (September 1992), pp. 313-329.

註³⁶ Peter Bachrach, *Power and Povert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43-44.

decisional) 程序，常是決定何等問題與決策選項能被政治體系考量，以及何種選擇能被決定的關鍵。^⑳

制度議程內存在兩種內在偏差，第一項偏差是決策者常會有優先考量舊有事項的傾向，第二項偏差則是決策者本身。在政治體系內，某些行為者（或行為群體）會較其他行為者，享有更多管道上的便利性，並且更能將需求置入議程內。這些具有議程設定優勢的行為者，或是位處社會暨經濟結構的戰略地位，所以難以忽略其利益，或是較其他成員擁有更多的資源，並得藉資源動員決定議程的最終設定。最後，由於某些政治體系的成員享有更多的公共尊重（public esteem），因此能夠對決策者施展更多的管道支配力。^㉑國際體系內權力分配的不均，造就了強權比一般國家享有更優勢的議程設定地位，並且在某些時候，這些強權國家本身，即是決定國際事務議程暨趨向之決策主導者。

該等國際政治、軍事、經濟、社會與文化地位暨資源的差異，造就了國際經貿法建構過程中的國際經濟典範設定國（paradigm-setting states）與典範接受國（paradigm-receiving states）。^㉒典範設定國以美國暨其他工業先進國家為代表，通常是國際經濟運作規則的決定者，典範接受國則以低度開發國家為代表，不但面臨國際經濟事務人才與人力短缺的問題，缺乏老練並有經驗的代表在國際組織內發聲，困窘的財政情況亦常致使這些典範接受國未能出席以及參與各項討論。遑論許多典範接受國在加入國際經貿組織時，根本無法改變既有規則的事實。

議程設定的管道進入點（access point），是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施展議程設定權力的重要關鍵。國家可以至少從四個領域，產生議程設定管道進入點，它們分別是知識（knowledge）、溝通管道（communication channels）、制度位置（institutional loci）與外交規範（diplomatic norms）。^㉓在知識領域的議程設定管道進入點，是全球知識生產中的位置（sites of global knowledge production），以及支持性的共識形知識（supportive consensual knowledge）。溝通管道領域有三項議程設定管道進入點，分別是對跨國網絡之連結（linkages to transnational networks）、相對其他國家的捐客地位（brokerage positions vis-à-vis other actors）以及媒體影響力（influential media）。制度位置領域的議程設定管道進入點有二：第一是在重要國際組織或國際建制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地位（formal or informal position），其次是組織性依賴能力（organizationally dependent capabilities）。例如高峰會議等具正當性的行動強制事件（legitimated action-forcing events），是外交規範領域的第一項議程設定管道進入點，而聯盟結構與差異性的強國

註 ⑳ Roger W. Cobb and Charles D. Elder, "The Politics of Agenda-Building: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for Modern Democratic Theory," pp. 901-903.

註 ㉑ *Ibid.*, p. 908.

註 ㉒ Edward Kwakwa, "Regulat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What Role for the State?" in Michael Byers, ed., *The Rol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32-234.

註 ㉓ Steven G. Livingston,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Agenda-Setting: Reagan and North-South Relations," p. 316.

地位，構成了地位依賴式 (status-dependent access) 的外交規範議程設定管道進入點，外交規範領域的最後一項議程設定管道進入點，乃是諸如法律等支持性總體性規範 (supportive general norms)。^{④①}

檢驗國際組織中的決策影響力發現，國家地位是決定國際組織決策的重要關鍵。國際社會中，在經濟資源上具有相對優勢的國家，因能夠派遣人數眾多的代表參與國際組織運作，並在本國設有幕僚機關處理相關事宜，所以在特定的國際組織決策過程中，能較一般國家有更好的表現，展現更大的決策影響力。^{④②}相較之下，小國代表如欲在國際組織的決策過程中發揮影響力，多須仰賴國家代表個人的人脈關係 (association)、知識與談判能力，或是結合其他國家的代表，形成堅實的行動聯盟。^{④③}國際經貿法的建構過程，存在著對強權國家有利的先天性偏差，強權國家派駐在國際組織的代表團，代表了強而有力的人力、物力與專業知識後盾，相反地，一般小國只能仰仗有限的個人資賦，完成保障國家利益的艱鉅任務。

當某項國際經貿規範被典範設定國所創設之後，典範接受國通常僅具備有限的議程設定能力去改變此一國際經貿規範。國際經貿規範是國家間政治談判的結果，談判資源與選項是決定國際經貿規範實質內涵的關鍵。就法律觀點言之，強權不但較一般國家擁有更多的法律資源，並且更能有效地動員這些法律資源，使強權在國際規範的創設與實踐過程中，擔任法官 (judge)、陪審員 (jury) 與警察 (policeman) 的角色。^{④④}國際經貿規範藉國際制度建構完成後，有意改變規則的國家在提案改革時，可能面對制度內既得利益者的強大反擊，如若退出該種制度，或蓄意瓦解該等國際規範，又恐將對本國造成傷害，所以典範接受國甚難透過國際制度的改革，改變不利的利益分配格局。^{④⑤}

隨著國際社會的內在演化以及國家資源暨地位的差異，國家運用議程設定模式的傾向亦隨之變化。議程有三種設定方式，分別是「外生模式」 (outside initiative model)、「動員模式」 (mobilization model) 與「內生模式」 (inside initiative model)。^{④⑥}分析議題的啟動 (initiation)、明確 (specification)、擴散 (expansion) 與進入 (entrance) 議程等四個階段，「外生模式」的發動者，是決策機制以外的非政府群體，經由利益的連結，先將某一議題變成體系議程後，再對決策機構形成壓力，使該議題成為制度議程的內容；「動員模式」的發動者，則是決策機制內的政治領

註④① *Ibid.*, pp. 316~317.

註④② Robert W. Cox and Harold K. Jacobson, "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in Robert W. Cox and Harold K. Jacobson, eds., *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Decision Mak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393.

註④③ *Ibid.*, pp. 394~396.

註④④ Miles Kahler, "Conclusion: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Leg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3 (2000), p. 666.

註④⑤ Lloyd Gruber, *Ruling the World: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 pp. 89~90.

註④⑥ Roger Cobb, Jennie-Keith Ross, and Marc Howard Ross, "Agenda Building as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Process," pp. 128~137.

袖，故而該議題早已被列入制度議程，但為獲得群眾支持，於是透過宣傳，使該議題先成為體系議程後，再順理成章地納入制度議程；「內生模式」是由決策機構內之單位或與決策機構有密切關係的群體所啟動，卻刻意限制大眾認知該議題的內容，並在有限之特定群體的策動下，對決策者形成壓力，將該議題納入議程。^④國際社會中，議程的「外生模式」以《禁止殺傷人員地雷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Use, Stockpiling, Production and Transfer of Anti-Personnel Mines and on their Destruction) 為代表，它是由國際社會中的某些人道團體鼓動風潮，而後對國家形成輿論壓力，最終迫使國際組織討論此一議題，並且迫使國家做出回應。^⑤「動員模式」以創設不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 作為代表，美國在二次大戰結束時，就已經對戰後國際社會秩序作出前瞻性的規劃，透過宣揚民主自由制度的珍貴與避免全球金融災難的必要性，即促使全球主要國家就全球金融控管制度之建立達成共識。

「內生模式」則以《禁止核擴散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的討論過程為代表，它是美國與蘇聯在冷戰時期的傑作，該議題的提出到最後的定案，完全由美蘇兩國主導，其他國家則完全被排除在議程設定的程序之外。^⑥

比較政治的研究發現，就議程之接觸管道(agenda access) 而言，一個社會愈平等，議程「外生模式」發生的可能性愈高；如若社會中政治與財富的集中度愈大，則愈可能呈現議程的「內生模式」；社會中的政治領導者與追隨者的社會距離愈大，或是政治領袖被視為具備特殊見識或卓群的權力，則較易發生議程的「動員模式」。^⑦社會中的特定群體能否成功地將某個議題列入議程，取決於該群體在社會中的政治地位，不同地位的群體所運作的策略傾向亦有所不同：一、物質資源相對弱勢但是潛在人數眾多的群體，通常採用「外生模式」；二、社會中的孤立或邊緣群體，愈可能採用暴力或是威脅使用暴力的方式，試圖將議題列入議程；三、區域內經濟或族群的同質性愈高，愈可能在議程衝突中動員其居民；最後，愈是在社會中代表某個低下階級利益的群體，愈可能運用「外生模式」，愈是代表上層階級利益的群體，愈可能運用「內生模式」。^⑧處於國際權力分配不均等並且國家地位高低有別的無政府國際社會，握有國際資源優勢的強權國家，在國際經貿規範的建構過程中，多傾向以議程的「內生模式」主導國際經貿規範的法制化。

註④ Ibid.

註⑤ 有關非政府組織在推動禁止人員殺傷地雷公約的議程設定作用，請參考 Kenneth R. Rutherford, "The Evolution Arms Control Agenda: Implications of the Role of NGOs in Banning Antipersonnel Landmines," *World Politics*, Vol. 53, No. 1 (2000), pp. 74~114. 但吾人亦不能忽略，鼓動風潮的非政府組織，例如國際反地雷組織(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 ICBL)，亦是以北美與西歐的非政府組織為主。一般經濟弱勢國家企圖在國際社會中創造某種輿論與設定議程，其成效仍是十分有限。

註⑥ 美蘇主導核不擴散條約談判議程的過程，請參考 Edward Brown Firmage,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63, No. 4 (1969), pp. 711~746. 該條約的談判過程均以美蘇的建議案作為討論方向，其他國家根本沒有置喙的餘地。

註⑦ Roger Cobb, Jennie-Keith Ross, and Marc Howard Ross, "Agenda Building as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Process," p. 137.

註⑧ Ibid.

「內生模式」議程設定程序所具備的幾項特點，成為強權國家在建構國際經貿規範時所青睞的運作手段。首先，在內生模式下，議題的提出、明確與擴散階段，皆被限制在特定的群體與範圍之內，^⑫是「密室交易」的代表。一般社會大眾不理解亦無興趣關注國際組織內的活動，所以強權國家在國際經貿規範建構過程中，很容易運用「內生模式」，將某個議題納入國際組織的討論議程。第二，操作「內生模式」的特定群體，因具備與決策機關關係密切的優勢地位，議題背景與操作目標的契合，提高了在有限討論的參與者之內取得支持的可能性。^⑬第三，「內生模式」的議程操縱者常運用議題的急迫性或嚴重性，迫使決策機關在一定的時間內，作出有利於議程操縱者的決策，如果決策機關未達成結論，則將付出相當代價，這種決策的不耐，製造了一種有利於議程設定者但不利於修正者之不對稱狀況。^⑭最後，議程操縱群體會提出具體的議程與決策草案，使決策機制無法、或是很困難、或者必須付出相當代價，才能夠修改議程設定者的提案，議程設定者在該等情況下因具備類獨裁權（quasi-dictatorial powers）地位，進而能夠驅策決策機制，通過一個最符合議程設定者的理想議程與決策內容。^⑮

關貿總協（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與世貿組織內之地位對等與決策共識決的特性，似乎不容許強權運用議程設定手段，主導國際經貿規範的內容，實則不然。關貿總協與世貿組織所處理的事務皆具高度的專業性，不同成員所處的國際經貿地位不盡對稱，不同成員對於同樣議題的瞭解與認知亦存在鴻溝，不見得所有成員皆有對特定議題提出具體的草案，並且不同的成員承擔世貿規則義務的能力亦明顯有別，凡此皆係有利於強權運作的條件，透過非正式議程設定能力的運用，強權得以主導國際經貿規則之制定。^⑯檢驗關貿總協時代之決策過程發現，美國與英法等國是主導關貿總協決策的議程操縱者，^⑰主權平等與共識決策，不能阻止強權運用議程設定操控國際經貿規範的法制化過程。

肆、市場擾亂概念之法制化過程

觀察國際經貿法中，「市場擾亂」概念的法制化過程可以發現，強權透過國際經貿組織的議程控制與談判結果，排除不符合強權利益的規則，在國際制度中植入符合強

註^⑫ *Ibid.*, p. 135.

註^⑬ *Ibid.*

註^⑭ George Tsebelis, "The Power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s a Conditional Agenda Set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1 (1994), p. 131.

註^⑮ *Ibid.*

註^⑯ Richard H. Steinberg, "In the Shadow of Law or Power: Consensus-Based Bargaining and Outcomes in the GATT/WTO," p. 354.

註^⑰ Gerard Curzon and Victoria Curzon, "GATT: Traders' Club," in Robert W. Cox and Harold K. Jacobson, eds., *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Decision Mak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298~333.

權利益的規範概念，並透過國際制度之程序規定，法制化符合該等強權利益的國際經貿規範。倘若面對內在與外在的挑戰，強權國家則力圖延續該等利己之規範概念，透過議程設定，在其他國際制度下夾帶該項核心概念，藉以延續該項規則之法制化地位，持續運用於特定領域或特定國家，維繫並保障強權的特定利益。

一、排除不符合強權利益的議程

日本於 1953 年申請加入關貿總協，為預防日本的廉價紡品在入關後損及英國在澳洲、紐西蘭暨南非等大英國協（Commonwealth）市場的利益，英國遂提出「貿易擾亂」概念，並希冀藉由 GATT 1947 第 19 條暨第 23 條的修正，訂定得以限制日本產品進口或者施加額外關稅的特殊條款。最後，英國提案因遭到美國強力反對，而未被納入 GATT 1947。

1953 年，英國在關貿總協中提議，在日本入會議定書中明訂，締約國得在下列情況下對日本產品採取特別措施：1.倘若任何自日本輸入締約國之貨品數量，對進口國生產同類或直接競爭貨品（like or directly competitive products）的國內生產商（domestic producers）造成或是威脅造成嚴重損害（cause or threaten serious injury）；或是 2.任何自日本輸入到某一締約國境內的貨品數量，對位處同一優惠區域之其他領土內的同類或直接競爭產品之生產，造成或威脅造成嚴重損害。^⑧由於該案係針對日本而設，復遭到美國強烈，英國提案因此未能持續運作。^⑨

雖然英國提案胎死腹中，但英國仍企圖藉由 GATT 1947 第 19 條暨第 23 條的修正，將貿易擾亂概念融入關貿總協規範。首先，英國試圖修正 GATT 1947 第 19 條（特定產品輸入緊急措施）第 1 項的規定，將日本貨品造成的擾亂情事，增列為締約國採行緊急措施的要件。^⑩

但如此大幅更正 GATT 1947 第 19 條的舉動，引起眾多締約國的強烈反對，^⑪英國繼之尋求修改 GATT 1947 第 23 條的規定，但仍未告成功。第 23 條乃是利益受剝奪（nullification）或減損（impairment）條款，該款規定，當一締約國在協定內所應享有之權益受到直接或間接的剝奪或減損時，得向其他締約國或認為有關之締約國提出書面意見及建議，其相對締約國應回應以慎重考量。英國等大英國協認為，該款對立即受到威脅的貨品而言，顯然緩不濟急，於是提出 GATT 1947 第 23 條的修正案。但關貿總協特別委員會於 1953 年 2 月 13 日的會議中認為，沒有必要修正第 23 條，但有必要補充在緊急情況下得授權締約國採取某些措施的程序性安排，以回應第 23 條第 1 項

註⑧ 請參考澳洲外務暨商務部檔案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To Cabinet By Menzies," *Submission 521*, Vol. 20, No. 39, August 11, 1953, <http://www.info.dfat.gov.au/info/historical/HistDocs.nsf/vVolume/411944F37EEF58C7CA256D96000B9381>. (viewed 2006/11/30).

註⑨ 同前註。

註⑩ 關於英國提議的修正內容，請參閱 Para. 7, Ad Hoc Committee on Agenda and Intersessional Business, "Report on the Accession of Japan," February 13, 1953, L/76, p. 2.

註⑪ 同前註。

第3款所言之「其他任何情況」(existence of any other situation)，^②並建議以締約國共同宣言的方式提出。^③但此項宣言草案最後不了了之，英國試圖在關貿總協增修貿易擾亂條款的企圖，並未成功。

在未能獲得絕大多數締約國支持修約的情況下，英、法、荷、比、盧等14個締約國於是轉而主張對日本適用GATT 1947第35條的排除適用條款，在1955年日本正式加入關貿總協後，拒絕給予日本最惠國待遇。而1955年以後入關的締約國，亦多以第35條之排除適用條款圍堵日本產品。日本於1960年預估，對日本援引第35條的國家數目計達30國之多。^④儘管英國試圖在關貿總協植入貿易擾亂條款的企圖未竟全功，不過，卻為爾後市場擾亂概念的定型，奠定進一步的發展基礎。

綜上述，英國未能克服美國之議程控制，是市場擾亂概念被列入正式議程之前即告無疾而終的主要原因。縱觀英國在50年代之策略，首選係在日本入會議定書中，制定特別針對日本的貿易擾亂條款，其次才是在GATT 1947第19條暨23條中，增修貿易擾亂啟動要件，作為防阻日本貨品的防線。不過時值冷戰初期，美國力圖扶植日本成為亞洲抵抗蘇聯、中國暨北韓的重要堡壘，^⑤並適逢關貿總協亦在草創階段，如果在日本入會議定書中設定歧視性條款，顯然將對關貿總協所倡議的自由貿易造成不利的影響。其次，修正第19條暨23條或許得以免除日本貨品的威脅，但該等特殊限制措施在關貿總協不歧視原則的運作下，勢必會對其他締約國的出口貨品造成普遍性的影響，甚至可能回過頭來打擊到大英國協會員與英國的貿易關係，修法後可能適得其反。^⑥新興萌芽的貿易擾亂概念就在美國的攔阻下受挫，不過此一概念很快就在美國的主導下重獲新生，並且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市場擾亂概念的定義化

自加入關貿總協後，日本紡品在全球市場佔有率不斷提昇，日本雖已採行一系列

註^② GATT 1947 第 23 條規定：「任一締約國如認為因下列原因……依本協定直接或間接可得之利益已被取消或受到損害：……（三）其他任何情況……則得以向其他締約國或認為有關之各締約國提出書面意見及建議，其相對締約國應回應以慎重考量。」

註^③ 特別委員會在締約國宣言草案中之揭示內容，請參考 Paras. (a) and (c), Ad Hoc Committee on Agenda and Intersessional Business,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declare," p. 4.

註^④ Application of Article XXXV to Japan, GATT, Japanese Delegation, "Statement by the Leader of the Japanese Delegation to the Seventeenth Session on 18 November 1960," November 29, 1960, L/1391, page 1; GATT, Japanese Delegation, "Statement by Japan on 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of Japanese Exports, Restrictions and other Measures Relating to the Problem of Market Disruption," Annex C, May 17, 1960, L/1164.

註^⑤ William R. Keylor, *Twentieth-Century World-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4th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59-360.

註^⑥ 1953 年的英國提議具強烈的針對性，在提議中直接指出「日本」一詞，GATT 1947 第 19 條「特定產品輸入之緊急措施」第 1 項之修正案，則以「締約國」一詞取代「日本」一詞，迴避對日本國的針對性，但如此修改的結果，該等特別限制透過不歧視原則的運作，將回過頭來約束所有的締約國，其結果反而得不償失。

的自我設限措施，但美歐的本國產業仍面臨日本貨品的低價競爭。如若歐美等已開發國家繼續運用關貿總協防堵日本暨新興國家的紡品，則將不利於全球貿易的開展。於是大英國協的貿易擾亂概念再度浮上抬面，並在美國的主導下日趨複雜，成為紓解美國本土產業競爭壓力的重要機制。

時至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期，美國開始規避關貿總協的自由貿易精神，試圖尋求其他得以保護美國紡織業的正當手段。美國首先與日本在 1957 年簽署雙邊協定，要求日本採取自願出口限制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 VER) 措施，以紓緩美國本土市場的壓力。日本的出口自我設限措施，反映了弱國在雙邊談判中畏懼強權國家採取嚴格市場進入管制的不利地位。弱國因報復能力缺乏，為了進入強權國家市場，不得不接受雙邊條約之不利條件，以暫時性的讓步換取長期的市場進入機會。^⑥但歐美等已開發國家如果一再運用配額或是關稅等方式回應日本以及新興國家的競爭壓力，顯然又不利於全球貿易的進一步發展。於是創造一個新的法律基礎，藉以正當化保護主義 (protectionism)，成為美國規避關貿總協國際經貿規範的另一個選項，英國在 1953 年提出的貿易擾亂概念，正是美國尋求出路的最佳選擇。

美國將貿易擾亂的概念加以修正後，另行提出「市場擾亂」一詞，並主導市場擾亂議題的議程設定。1959 年底，美國開始在關貿總協內正式提出市場擾亂議題。美國國務次卿迪倫 (Douglas Dillon) 在部長會議中倡議成立專家委員會，針對貨品之「猝然入侵」(abrupt invasion) 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進行深入研究。^⑦美國代表於 1959 年 11 月 19 日舉行的關貿總協第 15 會期第 17 次會議中指稱，進口產品在一時間內的急遽增加 (sharp increases) 將對進口國造成嚴重的經濟、政治暨社會反彈，故而應在關貿總協的架構下處理該等問題，俾加速自由貿易的拓展。^⑧日本代表則辯護，該等事項應透過 GATT 1947 第 22 條的友好諮商或出口國的自我出口管控加以解決，^⑨但日本觀點未能阻止關貿總協討論市場擾亂議題。關貿總協秘書處最後在 1960 年 5 月 17 日發表「有關市場擾亂問題之限制暨其他措施」報告 (Restrictions and other Measures Relating to the Problem of Market Disruption)，回覆締約國在紡品問題上所面臨的進出口問題，並提出綜合性的事實陳述，作為締約國是否在第 16 會期成立工作小組之參考。^⑩

在獲得絕大多數國家支持的情況下，美國讓市場擾亂順利成為關貿總協的討論項目。關貿總協第 16 會期隨即在 1960 年 6 月 3 日決議，設立「避免市場擾亂工作小組」(Working Party on Avoidance of Market Disruption) 研究市場擾亂問題。^⑪該工作小組

註⑥ David B. Yoffie,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ction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4 (1981), p. 577.

註⑦ GATT, "Summary Record of the Seventeenth Meeting," held at the Sankei Kaikan, Tokyo, December 7, 1959, SR.15/17, p. 153.

註⑧ *Ibid.*

註⑨ *Ibid.*

註⑩ GATT, Japanese Delegation, "Statement by Japan on 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of Japanese Exports, Restrictions and other Measures Relating to the Problem of Market Disruption."

註⑪ Annex I, GATT, Working Party on Avoidance of Market Disruption, "Report on the Working Party on Avoidance of Market Disruption," November 18, 1960, L/1374, page 4.

由英、美、法、德、比利時、瑞典、奧地利、澳洲、巴西、印度、日本以及巴基斯坦等國的代表所組成，^⑥其中除了日本、印度暨巴基斯坦之外，均是可能遭受該三國紡品競爭壓力的當事國，在一面倒的情況下，日本立場受到壓縮。討論過程中，亦僅有美國針對市場擾亂問題提出討論意見，日本未提出異議，印度除要求各締約國重視全球自由貿易的目標外，亦未反對美國的提議。^⑦

設立工作小組是美國擴散議題的重要步驟。工作小組在1960年11月18日的報告中強調，無論GATT 1947是否有因應市場擾亂的防衛措施，市場擾亂問題的政治暨心理作用，皆令人質疑任何有意在協定外尋求解決方案之締約國，會放棄採行其他的因應手段。工作小組並依據1960年9月12-16日第17會期間的討論結果，於11月18日的報告中建議，在締約國以書面認可市場擾亂問題確實存在的前提下，倘若締約國能就市場擾亂問題，建立廣泛性的雙邊或多邊諮商架構，則將有助於生成更具建設性之解決方案。^⑧避免市場擾亂工作小組報告書並在11月19日的締約國全體大會中透過共識決的方式順利獲得通過。工作小組是項建言，為爾後棉紡織品雙邊暨多邊國際經貿協定的制定，產生催化作用。

工作小組報告書將市場擾亂一詞鑲嵌成為國際經貿概念。1960年11月19日的關貿總協締約國全體大會除了決定設立「避免市場擾亂委員會」(Committee of Avoidance of Market Disruption)外，並且依據工作小組報告書的內容，^⑨在決議文中首度定義市場擾亂的內容。決議文將價格、數量、損害以及因果關係設定為市場擾亂的基本要件，雖未提及特定締約國，但明示市場擾亂係針對特定來源之特定貨品而設，開啓針對「特定國家」施行防衛措施的先例。^⑩據GATT 1947第19條的規定與精神，締約國僅得以針對「特定產品」採取防衛措施，但關貿總協的決議文，似為關貿總協開啓一道不歧視原則的後門，明訂締約國得以針對「特定來源」的特定產品採取措施。

至此，在美國主導下，原來不存在的市場擾亂概念，透過關貿總協之工作小組報告，被賦予粗略的定義，是強權利用議程設定置入符合強權利益之國際經貿概念的典範。

三、市場擾亂定義的規則化

市場擾亂定義的出現並非偶然，其主要目的在處理日本等國的廉價紡品對歐美等國之本土產業所造成的競爭壓力。市場擾亂定義化之後，即為新的國際經貿規範奠定有力的出發點。而避免市場擾亂工作小組報告書中有關建立雙邊或多邊諮商架構的建

註⑥ GATT, Working Party on Avoidance of Market Disruption, "Avoidance of Market Disruption, proposed by the Chairman."

註⑦ GATT, Indian Delegation, "Avoidance of Market Disruption: Statement by Mr. S.T. Swaminathan (India) at the Meeting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on May 31, 1960," L/1129.

註⑧ GATT, Working Party on Avoidance of Market Disruption, "Report on the Working Party on Avoidance of Market Disruption," L/1374, page 1.

註⑨ Note of page 16, GATT, "Decisions of Seventeenth Session, December 5, 1960," L/1397.

註⑩ 關於決議文之「市場擾亂」定義，請參閱 Paras. (a) and (b) of page 15 and note of page 16, *ibid.*

議，則為市場擾亂爾後的規則化鋪路，國際間有關市場擾亂之雙邊暨多邊的不對等經貿條約^⑧隨即呈限快速增加的趨勢。

透過「棉紡織品國際貿易短期協定」(Short-term Arrangement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otton Textile, STA)與「棉紡織品國際貿易長期協定」(Long-term Arrangement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otton Textile, LTA)的簽署，市場擾亂終於藉多邊條約形式正式成為國際經貿規範。自從1960年關貿總協大會通過市場擾亂的決議文後，該定義隨即在1961年7月21日被納入STA，並另外增訂市場擾亂得為進口國採行數量限制之依據。^⑨STA的簽署，凸顯了美國透過「內生模式」的議程操縱，迫使締約國在短期內簽署國際條約，作出有利於美國的決策，並法制化某種國際經貿概念的典範。

在美國的主導下，STA所律定的市場擾亂規則，實則不利於關貿總協自由貿易體系的發展。首先，參與簽署STA的關貿總協締約國，除可運用GATT 1947第19條的緊急措施外，並可另外透過棉紡織品多邊國際經貿條約，依據關貿總協未規範的市場擾亂條款，另外採行數量限制措施。^⑩換言之，透過關貿總協簽署之國際經貿多邊條約的加持，數量限制措施轉而成為關貿總協締約國預防或補救市場擾亂的主要手段。吾人或許認為STA中有關數量限制的規定已違反GATT 1947第11條的規定，實則不然，因STA的數量限制方式，乃係以「自我設限」的方式進行，在協定未明言禁止的情況下，透過出口地自我設限形式所採取的「灰色承諾」不必然構成協定的違反。^⑪此外，就GATT 1947第19條而言，補償是採行第19條緊急措施的前提要件，^⑫報復則

註^⑧ 單邊施惠於多方締約國的國際條約，有學者以為這種型式的條約乃國際法上所謂的不平等條約(Unequal Treaties)。此謂的「平等」(equality)，指的是法律的而非政治上的意涵，意即各國在法律之前所享有的合法地位、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權限，並且無論國力的大小，在法的操作上皆具同等的法律運作能力。換言之，不論一國政治影響力的強弱，所有國家在國際法之前，皆處於相同(alike)地位，並且所有國家在國際法之前，皆具有行使權利與擔負義務的同等能力。否則即是所謂的不平等。曾雅真，「論中國入世之過渡時期紡品特別防衛承諾—以美中紡品限額談判的實踐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49卷第3期(2006年7月)，頁57。

註^⑨ 關於STA之市場擾亂定義，請參閱“Extract from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Decision of 19 November 1960,” Appendix A, in GATT, “Arrangements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otton Textile,” August 24, 1961, L/1535, p. 19.

註^⑩ 除了GATT 1947第11.2條的例外規範外，數量限制係GATT 1947第11條所明言禁止的措施。

註^⑪ 灰色措施包括如自動出口設限(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自願設限協定(Voluntary Restraint Agreement)、秩序化行銷協定(Orderly Marketing Agreement)等。在GATT時代，「自我設限」之灰色承諾被視為灰色區域的主要原因至少包括：一、透過出口地自我設限形式所採取的數量限制措施，未被GATT 1947第11條所明言禁止，又以進口國並未針對進口貨品採取具體的進口限制措施，在法律上甚難認定進口國是否違反GATT 1947第11條的事實；二、鑑於出口國的自我設限措施對其他締約國權益不至造成影響，因此亦難成為其他締約國控訴的爭點。綜上述，透過自我設限形式所採取的數量限制灰色措施，直到WTO時代，始被GATT 1994 WTO防衛協定第11.1條(b)款所明言禁止。關於灰色措施之論述，請參閱：洪德欽，*法律與政策專題研究*(台北：新學林出版社，2005年)，頁136-168；羅昌發，*國際貿易法*(台北：元照出版社，2000年)，頁487-490。

註^⑫ GATT 1947第19.2條。

是當事國未獲得補償的正當權益，⁸³但 STA 皆未有所規範。於是，在 STA 下，受限的一方不但沒有採行報復的權力，更無獲得補償的管道。最後，在無明確定義的緊急情況下（critical circumstances），STA 准許參與國得採取臨時性的進口數量限制措施，授予進口國相當大的自由裁量空間。為此，香港及日本即針對 STA 有關緊急情況的部分作了保留。⁸⁴當然，在臨時性協定的框架下，為期不過一年的 STA，或容許採取一些模糊的空間，但上述缺漏，亦未在 1962 年 10 月 1 日生效的 LTA 中獲得修補。

1961 年 10 月 1 日生效的 STA 僅為期一年，各簽署國除了合議在關貿總協定第 19 會期籌組「棉紡織品臨時委員會」（Provisional Cotton Textiles Committee）外，並議定於 1961 年 10 月 9 日舉行會議，討論棉紡品長期設限議題。有關市場擾亂之各項實質與程序規範在 LTA 下日趨完備，效期長達五年的 LTA 於 1962 年正式生效。自從在 1967 年及 1970 年各延長三年之後，LTA 之市場擾亂規範似有規則化的趨勢。

60 年代來自日本、香港暨印度等國的紡品，係歐美等已開發國家施以限制性措施的主要對象，市場擾亂的規則化，對這些國家棉紡織品的銷售，增添額外的限制。在政治亦或經貿上皆無力阻絕市場擾亂概念法制化的情況下，日本選擇藉由精確化市場擾亂啟動要件的方式，限縮日本產業的損害範圍。⁸⁵日本在參與 LTA 談判時主張，市場擾亂情況問題應從改革無效率的企業著手，並透過棉紡織品出口的有序安排等措施加以解決；⁸⁶換言之，日本認為進口國不應單方對出口國施加壓力，進口國亦應承擔市場擾亂發生的部份責任。但日本是項建議並未形諸 LTA，致使出口國必須單方承受市場擾亂的後果，進口國卻無須為本國不具競爭力的產業進行任何輔導轉型的義務。儘管 LTA 仍未加以界定數量、損害以及因果關係等造成市場擾亂之實質基準，並將該標準的界定權留與參與國自由裁量，但市場擾亂在歷經 LTA 之實質與程序面的補充後，在 60 年代末暨 70 年代初期的演化已漸趨完備。⁸⁷

四、普遍化市場擾亂規則的挑戰

時值 70 年代，人造纖維的發明及普及，促使主要紡織品的材質發生巨大變化，並且新興的棉紡織品製造國，如台灣、南韓、香港以及東南亞等國家，亦紛紛以物美價廉的人造纖維紡織品扣關歐美市場。針對棉紡織品的 LTA 已難滿足實際需求，更無法

註⁸³ GATT 1947 第 19.3.2 條。

註⁸⁴ GATT, "Arrangements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otton Textile," L/1535, p. 11.

註⁸⁵ 關於日本的建議，請參閱 Para.2 (2), GATT, Provisional Cotton Textile Committee, "Japanese Proposals Regarding Long-term Arrangement," October 24, 1961, L/1596, p. 2.

註⁸⁶ *Ibid*, p. 1.

註⁸⁷ LTA 所指稱之市場擾亂，係指 1960 年 11 月 19 日大會決議文的市場擾亂，LTA 並將該決議文之市場擾亂定義置於 LTA 的附件 C。See Article 10 and Annex C, GATT, "Long-Term Arrangement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otton Textiles," October 1, 1962. 此外，LTA 第 3 條則針對附件 C 的定義施以實質暨程序之補充規範，相關要義，請參閱 Article 3, *ibid*. 從 LTA 條文中，吾人彷彿得以窺見日本的主張，包括 60 日的諮商期限、定義使用緊急措施的情況、將臨時性措施的施行期限限制在 60 日的諮商期限內，以及指定設限水平等。

為歐美等已開發國家紓解本國產業界所面臨的競爭壓力。此外，60年代所律定的市場擾亂概念儘管已屆周詳，但在70年代的發展背景下仍顯粗略，因此有必要進行更為精確的界定。惟在關貿總協架構下，透過關貿總協之談判程序所簽署之國際協定的實質內容，已明顯悖離關貿總協的不歧視原則，因而引起新興工業國家的反彈，國際經貿規範的調和與均衡，成為強權國家所必須解決的重要課題。

歷經兩次三年期的延長後，LTA 效期即將於 1973 年屆滿，關貿總協在 1972 年正式成立「紡品委員會」(Textile Committee) 後，隨即展開新的談判議程。過程中，歐美等已開發國家主張擴大限制措施，開發中國家則企圖擺脫 LTA 的限制。經過多國會商結果，終於在 1973 年 12 月 20 日簽署「紡品國際貿易協定」(Arrangement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extiles)，通稱為「多種纖維協定」(Multifibre Arrangement, MFA)，並於 1974 年元月一日生效。除了將限制範圍擴大至人造纖維以及毛紡織品，MFA 並對市場擾亂定義作出大幅修正，並從此成為進出口國之間簽署紡品雙邊協議的主要依據。

MFA 自 1974 年生效後，歷經六次延長，⁸⁸歷次的延長談判，更凸顯了一個內容有爭議之國際經貿規範在普遍化推展時所遭遇的挑戰。為紓緩簽署國的不滿，在現有架構內細緻化原有的定義與規則，是強權國家用以紓解新興工業國家反彈、防止經貿體系瓦解之因應手段，但紡品配額制度並未因此告終。MFA 對市場擾亂相關規則有諸多開創：附件 A 對於市場擾亂的實質內涵與損害的判讀要素新定有詳盡的規範。⁸⁹ MFA 第 3 條則續針對 LTA 的市場擾亂施以補充性的規範。⁹⁰ 整體而言，MFA 不但精確補充市場擾亂之價格與損害分析要素，並首度賦予協定簽署國通知義務，俾便紡織品監督機構之監督作業，不但明確定義市場擾亂措施的施行期限與可能的延長性措施，詳細的定義內容並已大幅降低措施啟動國的自由裁量權。⁹¹

然而，隨著全球經貿多邊制度的逐漸擴大，各種貨品貿易規則亦形成巢窩式 (nesting) 結構，依據市場擾亂所創設的紡品配額制度，與關貿總協規範的悖離日漸擴大，為避免整體自由貿易體系的瓦解，並增加國際社會成員參與國際經貿制度的誘因，有關紡織品配額制度的修正需求，日益迫切。⁹² 此外，鑒於紡織業的進入門檻低，紡品出口國已不再侷限於昔日的日本等少數國家，這些為數眾多的紡品出口國，亦不

註 88 紡織品國際貿易協定之有效期為 1974 年 1 月 1 日至 1977 年 12 月 31 日，爾後其效期有五次延長，分別是 1978 年 1 月 1 日至 1981 年 12 月 31 日，1982 年 1 月 1 日至 1986 年 7 月 31 日，1986 年 8 月 1 日至 1991 年 7 月 31 日，1991 年 8 月 1 日至 1992 年 12 月 31 日，1993 年 1 月 1 日至 1993 年 12 月 31 日，1994 年 1 月 1 日至 1994 年 12 月 31 日。

註 89 附件 A 對於市場擾亂的實質內涵與損害的判讀要素定有詳盡的規範，相關要義請參閱 Annex A, GATT, "Arrangement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extiles," December 20, 1973, Instrument No. 135.

註 90 除了承繼 LTA 的內容外，MFA 第 3 條續針對 LTA 的市場擾亂施以補充性的規範，補充要義請參閱 *ibid.*, Article 3.

註 91 儘管如此，有關受限國補償與報復權力之缺漏，在 MFA 仍未見補強。即便如此，歷經 MFA 的補充，市場擾亂定義至此已正式邁入成熟期。

註 92 Vinod Aggarwal, "The Unraveling of the Multi-Fiber Arrangement, 1981: An Exam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7, No. 4 (1983), p. 620.

滿於市場擾亂的紡品配額制度。

面對強大的修約壓力，1981年起，MFA的簽署國在關貿總協談判程序下展開紡品貿易的回歸談判，但各方角力不斷，幾經延宕，終於簽署「紡織品與成衣協定」(Agreement on Textiles and Clothing, ATC)，明定將自1995年1月1日起，以10年四階段為回歸期，分階段終結具有歧視性質的紡品數量限制措施，並自1995年1月1日生效，效期到2004年年底為止。

ATC雖是過渡性的安排，但大體上仍承襲了紡品國際貿易協定的傳統，惟不再於附件或在條文中明列「市場擾亂」一詞，而是直接將STA、LTA以及MFA的市場擾亂概念，納入ATC第6條的過渡性防衛條款，提供世貿會員低度的啟動門檻以及高度的自由裁量機制，藉以降低世貿會員之國內產業在回歸期內所可能遭受到的嚴重損害(serious damage)或嚴重損害的實質威脅(actual threat thereof)。⁹³紡織品配額制度雖然在2005年走入歷史，但市場擾亂概念非但未隨之消逝，反而因著中國的入世承諾正式鑲嵌進入世貿規範。

五、市場擾亂規則的重生

透過「內生模式」的議程控制，美國重新為市場擾亂概念注入新的內容，尤其是中國入世承諾的部份內容，彷彿是50年代英國提案的重現。

在ATC回歸後，市場擾亂概念再度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中國入世議定書」(Protocol on the Acce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第16條「過渡時期貨品特別防衛機制」(Transitional Product-Specific Safeguard Mechanism，以下簡稱中國TPSSM)，⁹⁴以及「中國入世工作小組報告書」(Report of the Working Party on the Accession of China)第242段的紡品特別防衛條款(Textile Special Safeguard，以下簡稱中國TTSS)⁹⁵正式成為世貿規範。中國TPSSM與中國TTSS設立的目的，在預防或補救自中國出口的貨品暨紡品，對其他世貿會員的內國市場，造成市場擾亂或者重大貿易移轉效應(significant trade diversion)。鑑於中國入世議定書暨入世工作小組報告之相關承諾，乃是世貿整體協定的一部分，⁹⁶故一體適用於全體會員。

世貿組織雖以國際條約形式制定了國際經貿的互動規範，但入世的談判程序卻為強權國家創造議程設定的有利空間。世貿組織的入世程序大致分為申請、談判、簽定入世議定書，以及決議等四個階段。有關世貿組織的入世規定主要見諸世貿協定第12條。世貿設立協定(Marrakec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第12條第(1)項規定，任何國家或個別關稅領域，「得依其與世貿組織的議定條件

註⁹³ Para 2, Article 6, WTO, "Agreement on Textiles and Clothing," 1995.

註⁹⁴ Article 16, WTO, "Protocol of Acce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WTO," WT/L/432, November 23, 2001.

註⁹⁵ Paragraph 242, WTO, "Report of the Working Party on the Accession of China to the WTO," WT/ACC/CHN/49, October 1, 2001.

註⁹⁶ 中國入世議定書第1.2條規定，中國入世議定書與工作小組報告書第342號段落所包括的承諾，皆係「WTO協定」整體的一部分。Article 1.2, WTO, "Protocol of Acce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WTO".

(on terms to be agreed) 加入世貿協定。」⁹⁷該款雖未述明何謂「議定條件」，但該詞卻是所有入世申請者必須進行入世雙邊暨多邊談判的法源依據。依據世貿規定，在入世申請國遞交入世申請書後，世貿組織隨即成立工作小組，審查入世申請案；而所有世貿會員均可要求與入世申請國就市場開放議題進行雙邊諮商，並逐一簽署雙邊協議。世貿組織秘書處隨後將依據各項雙邊協議及歷次工作小組會議的討論結果，草擬申請會員的入世工作小組報告暨入世議定書草案。待世貿部長會議以 2/3 多數決方式通過入世申請案，申請會員完成國內批准程序後，申請會員再將前述各項入世文件連同正式確認函遞交世貿秘書處，秘書處於接獲上述文件的 30 天後，申請會員始正式成為世貿的入會會員。⁹⁸就入會程序觀之，申請入會會員除了必需接受世貿組織既有的多邊規範外，⁹⁹世貿會員仍可藉入世雙邊談判之便，單獨要求入世申請者作出特殊承諾，世貿設立協定第 12 條的談判規範，無疑是強權會員向入世申請國取得額外承諾的最佳管道。

入世雙邊談判為強權開啓運用議程設定植入利於強權條款的管道，容許美國得藉中國入世議定書，接替將於 2005 年終止適用的 ATC，重新在世貿規範中植入市場擾亂條款。世貿規範必須遵守原則，是世貿設立協定第 16 條第 (4) 項的規範核心。¹⁰⁰而包括雙邊暨多邊承諾在內的工作小報告書暨入世議定書，不但是入會會員對世貿組織全體會員所作的入世承諾，並且被視為是世貿規範的一部分。任何雙邊承諾在申請會員正式成為入會會員時，即會在世貿不歧視原則的運作下，一體適用於所有會員。換言之，入會會員除了必須受世貿各項多邊協議的規範外，亦必須遵守在雙邊談判階段對世貿各會員所作的雙邊承諾。市場擾亂概念即是在美國主導下，經由美國與中國的雙邊諮商，¹⁰¹載入 1999 年 11 月 15 日簽署之「美中雙邊市場進入協定」(US-China Bilateral Market Access Agreement，以下簡稱美中協議) 的第三部份 (Section III

註⁹⁷ Para.1, Article XII, WTO, "Marrakec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greement) 1995. "Any State or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possessing full autonomy in the conduct of its external commercial relations and of the other matters provided for in this Agreement and the Mult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may accede to this Agreement, *on terms to be agreed between it and the WTO...*" (斜體為作者加記)。

註⁹⁸ 關於入世程序之相關資訊，請參閱：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acc_e/acces_e.htm

註⁹⁹ 世貿設立協定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入會會員需接受世貿組織既有的多邊貿易協定。但複邊貿易協定 (Plur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例外，申請入會會員可依其意願選擇是否受其約束。

註¹⁰⁰ Article 16.4 of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Each Member shall ensure the conformity of its laws,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with its obligations as provided in the annexed Agreements."

註¹⁰¹ 美國於 1995 年 11 月 9 日向中國送交了美國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立場文件，隨後雙方啓開雙邊談判，一直屢經波折，尤其是中國總理朱鎔基於 1999 年 4 月 10 日訪問美國，但未如各方預期達成協議，中間更發生美國戰機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事件，中國為此曾一度暫停與美國的談判。中國與美國直到 1999 年 11 月 15 日才在上海簽署中美入世協議。關於美中簽署雙邊協議之過程，請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國外交 1996 年版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 年)，頁 492；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國外交 2000 年版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年)，頁 486-487。

Protocol Commitments))，^⑩並成爲日後中國入世議定書暨工作小組報告的入世承諾內容。

對照美中協議以及爾後經世貿組織部長會議通過的中國入世文件發現，中國入世文件中有關市場擾亂一詞的用字與內容，幾乎一字不漏地抄錄美中協議第三部份的條文，定稿過程中，中國雖曾經力圖降低市場擾亂規則的損害程度，但最後仍不敵美國的議程控制能力。首先，中國 TPSSM 與中國 TTSS 有關市場擾亂的內容，一字不漏地照抄美中協議的市場擾亂條文，以至於美國的市場擾亂建議稿，成爲中國入世文件中有關市場擾亂規則的唯一草案，並被世貿全體會員一致地採納並接受。第二，未出現在美中協議但對中國有利的工作小組報告文句，絕大部份未被載入中國入世議定書。工作小組報告書第 243 至 250 段，明列市場擾亂裁量之實質要件暨世貿會員實施市場擾亂時應遵守的程序規範等，是中國得以限縮世貿會員對中國任意採行市場擾亂措施的關鍵。但是項有利於中國之規範，縱使被載入工作小組報告書，最終卻沒有被納入中國入世議定書成爲一體適用全體會員的入世承諾。^⑪顯見當初未被美國所接納的文字內容，在中國的爭取下，或會有幸出現在入世工作小組報告書的草案中，但最終仍沒有爲各方所接受。第三，未出現在美中協議的承諾內容，但仍成爲中國入世議定書之市場擾亂規範者，只有第 242 段 g 款，明訂不得對同一貨品同時實施中國 TPSSM 與中國 TTSS 措施。^⑫依據美中協議律定中國 TPSSM 與中國 TTSS 的結果，已致使中國成爲世貿組織下，唯一受到市場擾亂的歧視對象，並被剝奪世貿組織防衛協定 (Agreement on Safeguards) 所應享有之報復、補償暨事前諮商之權益，以及爲己利益辯論的機會，並致使中國難以訴諸世貿爭端解決機制，化解內容空泛並充滿自由裁量空間之中國 TPSSM 與中國 TTSS 對中國所施加的限制。^⑬

期間美國制定 421 條款之意義，更凸顯美國主導制定中國 TPSSM 的具體事證。

註^⑩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ummary of US-China Bilateral WTO Agreement, February 2000," <http://www.ogc.doc.gov/ogc/legreg/testimon/106s/daley0411attachment.htm> (accessed 2006/11/30); 「美中雙邊市場進入協定」已由美中商會取得公佈，請參考 The United States-China Business Council, "Full Text of US-China WTO Market Access Agreement" <http://www.uschina.org/public/wto/market/> (2006/11/30).

註^⑪ 入世工作小組報告書係透過中國入世議定書第 1.2 條的規定被納入中國入世議定書，成爲 WTO 法之整體規範的一部分；而中國入世議定書第 1.2 條的依據，則是入世工作小組報告書第 342 段：入世工作小組報告書中所有被納入中國入世議定書的相關段落，皆明言羅列其中。鑒於入世工作小組報告書中有關過渡時期紡品特別防衛的相關規定，只有第 241 與 242 號段落羅列在 342 段，爲此，唯有前述段落對其他世貿會員始生效力。請對照參考 Article 1.2, WTO, "Protocol of Acce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WTO," WT/L/432, November 23, 2001; Paragraph 242-250, "Report of the Working Party on the Accession of China to the WTO," WT/ ACC/CHN/ 49, 1 October 2001; Section III Protocol Commitments, The United States-China Business Council, "Full Text of US-China WTO Market Access Agreement," <http://www.uschina.org/public/wto/market/> (viewed 2006/11/30).

註^⑫ Paragraph 242 (g), WTO "Report of the Working Party on the Accession of China to the WTO,"

註^⑬ 曾雅真，「論中國入世之過渡時期紡品特別防衛承諾－以美中紡品限額談判的實踐爲例」，頁 58-63、76-83。

1975年，美國在國內特別針對共產國家之進口貨品制定406市場擾亂條款（U.S. Trade Act of 1974, Section 406）。^⑥與國際體系下之STA、LTA暨MFA等市場擾亂條款不同的是，美國的406條款係針對來自共產國家的貨品而設，STA、LTA暨MFA則係透過國際條約形式，約束來自締約國的棉紡織製品，而不是針對特定的共產國家。鑑於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406條款不再適用處於「轉型期」（transitional period）的中國，美國遂在1999年11月與中國完成入世談判後，重新針對源自中國的所有貨品，制定過渡時期421市場擾亂條款。^⑦取代406條款的421條款，是美國為落實美中入世雙邊談判成果，單獨針對中國所制定的暫時性規範。^⑧421條款規定，在中國入世後的12年過渡期內，美國得針對源自中國的進口貨品，施行有別於世貿組織防衛協定的市場擾亂歧視性措施。該款在2000年10月並藉「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法」（Normal Trade Relations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增修，正式成為美國的法律。^⑨就時間點觀之，421條款雖係美國的國內法，但該款早在中國入世之前即已制定；其次，就實體內容而言，除了美國另定之內部決策暨實踐程序外，中國TPSSM與421條款在量、損害暨因果關係之規範要件上並無二致。^⑩顯見中國TPSSM市場擾亂條款確是在美國主導下鑲嵌置入世貿協定。

美中雙邊談判過程中，中國並非沒有抗拒美國的要求，但最後仍然徒勞無功，坐

註⑥ 有關美國406條款從1975至1999年立法歷史如下，Pub. L. 93-618, title IV, Sec. 406, Jan. 3, 1975, 88 Stat. 2062; 1979 Reorg. Plan No. 3, Sec. 1 (b) (1), eff. Jan. 2, 1980, 44 F.R.69273, 93 Stat. 1381; Pub. L. 100-418, title I, Sec. 1411 (a), (b), Aug. 23, 1988, 102 Stat. 1241, 1242; Pub. L. 106-36, title I, Sec. 1001 (a) (6), June 25, 1999, 113 Stat. 130. See: http://caselaw.lp.findlaw.com/cascode/uscodes/19/chapters/12/subchapters/iv/parts/1/sections/section_2436_notes.html.

註⑦ 421市場擾亂條款即U.S. Trade Act of 1974, Section 421, Pub. L. 93-168, Section 421, as added Pub. L.106-286, div. A, Title I, Sec. 103 (a) (3), 114 Stat. 882. (Oct. 10, 2000), 19 U.S.C. § 2451.

註⑧ 關於美中入世談判背景，請參閱 Sylvia A. Rhodes & John H. Jackson, "United States Law and China's WTO Accession Proces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2, No. 3 (1999), pp. 497-510; Charles Tiefer, "Sino 301: How Congress Can Effectively Review Relations with China After WTO Accession,"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34, No. 1 (1999), pp. 55-93; Fabio Spadi, "Discriminatory Safeguards in the Light of the Ad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5, No. 2 (2002), pp. 421-443; John M. Brannelly, "The United State's Grant of Permanent Normal Trade Status to China: A Recipe for Tragedy or Transformation?" *Suffolk Transnational Law Review*, Vol. 25, No. 3 (2002), pp. 565-585; Brett G. Williams, "The Influence and Lack of Influence of Principles in the Negotiation for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eorg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 33, No. 3/4 (2001), pp. 791-847.

註⑨ 有關421法案之制定背景暨相關條文部分，請參閱：“United States, Congress Report 106-632,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06TH Congress 2d Session,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ay 22, 2000); Sec.103 of the Normal Trade Relations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ited States, Normal Trade Relations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ublic Law 106-286, 114 Stat. 881. (Oct. 10, 2000).

註⑩ 關於中國TPSSM與421條款之比較分析，請參閱：曾雅真，「論中國入世之過渡時期貨品特別防衛機制—兼論美國421市場擾亂特別防衛機制」，*東海大學法學研究*，第23期（2005年），頁189-190。

視市場擾亂條款被納入中國入世協議。中國在美中雙邊談判過程亦曾堅拒美國有關市場擾亂條款的提議，認為是項不對等協議將致使中國喪失廉價勞工暨低成本的優勢，^⑩並且企圖透過工作小組報告書第 245 段呼籲世貿會員審慎使用市場擾亂條款，在 246 段主張以細緻化市場擾亂內容限縮世貿會員自由裁量權。^⑪然而，工作小組報告書第 245、246 段最終仍未被納入最終議定書，中國不但簽署是項協議，並且完全照抄中美雙邊協議的市場擾亂文本。^⑫儘管中國代表團在 2002 年 11 月於世貿組織對市場擾亂問題表達再度關切的立場，^⑬美國仍以該款係中國在世貿架構下依循世貿程序所自願簽署的國際條約作為回應。^⑭除了口頭聲明外，中國自始至終皆未能阻卻市場擾亂條款對中國所施加的額外限制。

ATC 回歸後，市場擾亂規範再度使中國紡品重新受到配額限制。2004 年底 ATC 效期終止，全球紡品配額制度解除後，美國、歐盟與巴西隨即在 2005 年，先後對中國援引工作小組報告第 242 段，以市場擾亂為由，對中國外銷歐盟、美國與巴西的紡品，重新實施配額限制。中國與歐盟暨美國在歷經多回合的雙邊談判後，再度於 2005 年 6 月及 11 月分別與歐盟與美國簽署紡品配額協議，中國承諾將對特定的輸歐暨輸美紡品成衣，採取自我出口設限措施。^⑮繼美歐之後，發展中國家的實踐亦相繼展開。中國與巴西在 2005 年 12 月簽署中巴紡品設限協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和巴西聯邦共和國發展、工業和外貿部關於在貿易和投資領域加強合作諒解備忘錄》，中國自 2006 年 4 月 3 日起，同意巴西對原產自中國的紡品單方實行進口管理。^⑯此外，

註⑩ Fabio Spadi, "Discriminatory Safeguards in the Light of the Ad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 430.

註⑪ See WTO, paragraph 245 and 246, Report of the Working Party on the Accession of China to the WTO."

註⑫ Fabio Spadi, "Discriminatory Safeguards in the Light of the Ad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p. 435-438 and footnote 45 at p. 435; Section III Protocol Commitments, The United States-China Business Council, "Full Text of US-China WTO Market Access Agreement."

註⑬ See WTO, Committee on Safeguards, "Statement by the Head of the Chinese Delegation on the Transitional Review of China to the Committee on Safeguards," G/SG/W/192, 1 November 2002, pp. 3-4, available at <http://docsonline.wto.org> (accessed 2007/01/10); also see WTO, para.4, "Chairman's Report to the Council for Trade in Goods on Transitional Review of China," G/SG/58, November 18, 2002.

註⑭ See WTO, "Chairman's Report to the Council for Trade in Goods on Transitional Review of China," para.34.

註⑮ EU, "EU-China Textile Agreement 10 June 2005" MEMO/05/201, June 12, 2005 :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china/intro/memo05_201.htm. (accessed 2006/11/30) ;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cerning Trade in Textile and Apparel Products," 8 Nov. 2005, http://www.ustr.gov/assets/World_Regions/North_Asia/China/asset_upload_file91_8344.pdf (accessed 2006/11/30) 相關分析請參閱曾雅真，「論中國入世之過渡時期紡品特別防衛承諾—以美中紡品限額談判的實踐為例」，頁 58-63、76-83。

註⑯ 中國商務部，商務部公告 2006 年第 34 號，2006 年 4 月 24 日。

土耳其、秘魯、哥倫比亞以及厄瓜多等發展中國家，亦對中國紡品啓動 TPSSM 調查、採行 TPSSM 臨時措施或者 TTSS 措施，設限暨調查規模甚至遠甚美國與歐盟。¹⁰⁶ 2005 年全球紡品自由化之後，中國紡品出口再度受到配額限制，成爲市場擾亂規範的唯一犧牲者。

從市場擾亂概念的萌芽、市場擾亂概念的定義化、市場擾亂定義的規則化一直到市場擾亂規則之普遍化的過程，係一連串繁複錯雜之「法律概念」(legal concept) 到「法律條款」(clause) 的演化結果。¹⁰⁷ 大英帝國在 1953 年未能將貿易擾亂條款載入日本入關議定書的遺願，在近 50 年後，居然爲美國承襲，並藉世貿組織的雙邊談判管

註¹⁰⁶ 土耳其之紡品設限，請參考 Turkish Government, "With Respect to the Import of Certain Textile Products Published in the 3rd Repetition of the Official Gazette Number 25687 dated 31/12/2004," *Belirli Tekstil Ürünleri İthalatında Gözetim ve Korunma Önlemlerine Dair Yönetmelikte Değişiklik Yapılmasına İlişkin Yönetmeli*, available at <http://www.itkib.org.tr>; 秘魯依據中國入世議定書第 16 條對中國紡品採行採行 TPSSM 臨時性特別防衛措施，See WTO, "Transitional Product-Specific Safeguard on Imports of Textile Products and Clothing into Peru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SG/N/PER/1, G/SG/N/16/PER/1/Suppl.1, May 2, 2005 (previously circulated as document G/SG/67, 14 January 2004). 厄瓜多外貿暨投資委員會隨後於 2006 年 2 月 22 日在 215 號官方公報公告 06-018 號決議，以 2002-2005 年爲調查基期，對中國的 219 項紡品展開 TPSSM 調查。See WTO, "Notific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an Investigation on Imports to Ecuador of Textile Produc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SG/N/16/ECU/1, March 10, 2006. 2005 年 7 月 26 日和 8 月 1 日，哥倫比亞貿易工業和旅遊部分別發佈 0223 號和 0227 號決議 (RESOLUCION)，對原產自中國的 100 多項紡品啓動特別防衛調查。2005 年 8 月 16 日，哥倫比亞貿易工業和旅遊發展部又發佈 0249 號決議，對原產自中國的特定紡品及襪子啓動特別防衛調查。2005 年 8 月 17 日，哥倫比亞依據 0223 號和 0227 號決議之調查結果，發佈 2839 號法令，並且依據 0249 號決議的調查結果，發佈 3090 號法令，決定針對上述 100 多項受調查的部分紡品課徵 200 天之臨時性額外關稅，參考 Colombian Government, "Diario Oficial 45.985, Sabado 30 De Jilio De 2005, Ministerio de Comercio, Industria y Turismo, Resolucion Numero 0223 de 2005 and Resolucio Numero 0227 de 2005;" WTO, "Transitional Product-Specific Safeguard on Imports to Colombia of Certain Textile Products and Stocking and Other Hosiery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SG/N/16/COL/1 and G/SG/N/16/COL/2, October 3, 2005, p.2and p.10; Colombian Government, Miniterio de Comercio, Industria Y Turismo "Decreto Numero 2839 de 2005," 17 Ago 2005; WTO, "Notification Under Article 16.1 of the Protocol on the Acce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WTO, G/SG/N/16/COL/1/Suppl.1 21 mars 2006.

註¹⁰⁷ 法律概念與法律條款不同。法律概念通常是法學家藉由具體規則與案例之觀察，所歸納出來的概括性抽象觀念。對客觀事實的體悟固然是法律概念的根源，但不可否認的是，現今國際社會仍存在許多甚難被定義或理解之法律概念，故而常發生法律概念被草率使用或誤用的情況。反之，一項法律條款通常有其明確的設計原則、適用標的、實質暨程序性要件，並且有權利義務的明確規範。關於法律概念與法律條款之區別，請參閱薛波主編，*元照英美法辭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年），頁 814。GATT/WTO 一般性防衛救濟條款或有市場擾亂概念之身影，但市場擾亂條款與 GATT/WTO 一般性防衛救濟條款則存在極大差異。首先，「不歧視原則」是 GATT 1947 第 19 條特定產品輸入之緊急措施條款與後繼之 WTO 防衛協定 (Agreement on Safeguards) 的建構核心概念，市場擾亂條款則是奠基於「歧視原則」。其次，在拘束標的上，GATT 1947 第 19 條暨 WTO 防衛協定只論產品不論產地，「同類產品」(like products) 或「直接競爭產品」(directly competitive products) 是拘束標的。市場擾亂條款則係以雙邊或特定多邊條約單向規範源自「特定區域」之產品，不同協定適用不同限額標準。第三，二者之認定要件不同：如在損害要件方面，GATT 1947 第 19 條爲「損害」或「損害之虞」，MFA 則是「嚴重損害」或「實際嚴重損害之虞」；又如在數量的增加基準，GATT 1947 第 19 條爲「大量增加」，MFA 則是「急遽增加」、「實質增加」或「急速增加」。最後，在法之權利義務上，所有 GATT 締約國或世貿會員不但同等適用 GATT 1947 第 19 條的均一裁量基準（實體暨程序要件），享有同等交互援引之權力，各締約方所承擔之條約權利與義務，原則上亦符合均衡原則。反之，市場擾亂條款締約國之間並無同等交互援引權力，各締約方所承擔之條約權利與義務亦是處於不對等狀態。

道，於特定國家的入世議定書中，成功植入具個別針對性的歧視性條款，並透過不歧視規則的運作，成為全面性的限制條款，在世貿組織內，為美國暨其他世貿會員奠定歧視特定貨品來源的法律基礎。

伍、市場擾亂法制化過程中的議程設定

市場擾亂概念的演化過程顯示，某些國際經貿規範的特定內涵，實則係由強權國家所主導、催生，並賦予實質意義。強權透過議程設定的運作，創設並法制化有利於強權國家的國際經貿規則。該等國際規範的創設、演化乃至移植，雖不見得違反國際制度之程序正義暨主權國家的對等原則，但國際社會內各種既存的偏差，仍使得強權國家得以施展議程設定手段，削弱正義與衡平原則在國際經貿規範法制化過程中所應有的地位。

檢驗市場擾亂概念的法制化過程，可以發現強權運用議程設定的脈絡。強權通常透過「內生模式」的議程設定手段，依據國際制度的程序性規範，將符合強權利益的規範概念納入國際性的制度議程後，再另闢蹊徑，依據強權國家所提出的範本，創設與發展某種特定的國際經貿規範。此種國際經貿規範，在程序上或許符合國際制度的要求，但內容卻不必然切合該等國際制度的核心精神與宗旨。而當此種國際經貿概念面臨更迭甚或是終止的挑戰時，強權國家仍得以運用程序面的操作，在利於強權的雙邊談判管道下，再度將一個違反原來國際制度的實質規範，植入原國際制度之內。

排除不利於強權的議題，是強權在國際制度下運用議程設定的第一項特徵。理論上參與國際制度的所有國家，均有享有一致的提案權，但不同國家所提出的討論案或建議案能否順利出線，則受到國家在國際制度內相對權力地位高低的影響。^⑩以市場擾亂為例，1953年英國主張在關貿總協針對日本制定「貿易擾亂」條款的企圖，因受阻於美國而胎死腹中，但美國在1960年代承襲英國主張所重新提出的市場擾亂提案，卻因獲得大部份會員的認可而不斷的演化，並奠定爾後市場擾亂規則的發展基礎。

設定討論框架 (frame)，限定討論方向與內容，是強權在國際制度下運用議程設定的第二項特徵。關貿總協「避免市場擾亂工作小組」的討論，主要是以美國的提案綱要為基準。LTA 的談判過程，日本雖然提出建議草案，^⑪但是檢視最終的協議內容，美國主導的痕跡十分明顯。市場擾亂概念暨規範的演化核心，皆在討論如何提供已開發國家一個實施貿易救濟的法理基礎，甚少提及已開發國家本身在降低市場擾亂效應上所應承擔的義務。美國所擬定的市場擾亂討論框架，僅要求對手國單方面承擔市場擾亂的後果，卻特意忽略日本主張進口國應承擔產業競爭力下滑之部分義務的建議，致使市場擾亂國際條約呈現義務負擔不均等的特殊現象。直至今日，市場擾亂仍是一個由已開發國家所主導的配額限制條款，除了關貿總協時代的日本之外，市場擾

註⑩ John S. Odell, "Chairing a WTO Negoti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8 No. 2 (2005), p. 441.

註⑪ GATT, "United States Proposal for a Long-Term Arrangement," October 23, 1961. L/1592; GATT, "Japanese Proposal Regarding Long-Term Arrangement," October 24, 1961. L/1596.

亂條款的實踐仍侷限於已開發對開發中或者開發中國家之間。

第三，強權的建議，通常是國際經貿法制化過程的唯一建議案。除了同一產品不得同時實施中國 TPSSM 與中國 TTSS 措施的禁制性規定外，美國與中國於 1999 年達成的美中雙邊市場進入協定第三部分的規定，成為爾後中國 TPSSM 與中國 TTSS 的唯一內容。而其他利於中國的市場擾亂條款內容，如入世貿工作小組報告書第 243 至 250 段落，則全數未被納入中國入世議定書，未能成為中國世貿承諾暨世貿整體規範的一部份，進一步凸顯了強權操控國際經貿議程的有利地位。

第四，運用現有之國際制度的架構與程序，另闢蹊徑，創設、發展甚至移植不同於原有國際制度的規範概念，是強權在國際制度下運用議程設定的第四項特徵。市場擾亂概念的生成，雖是美國在關貿總協內提案討論的結果，甚至爾後 STA、LTA 以及 MFA 等多邊暨雙邊條約的簽署，亦是各條約締約國在關貿總協架構下依循 GATT 談判程序所建立的成果。在實質內涵上，該等市場擾亂條約已明顯違反關貿總協權利暨義務均等之不歧視性特質，但形式上則未違反原制度之正當程序。同樣的，中國入世的中國 TPSSM 暨中國 TTSS 的實質內涵，亦有世貿協定適法性之疑慮，但該市場擾亂條款係美國與中國依據世貿程序雙邊協議的結果，在締結程序上亦符合世貿組織的正當程序。¹²²惟在市場擾亂條款下，是項入世程序卻為美國提供一個利於美國議程設定的場域，將一個即將在原制度下終結的國際經規範，重新植入原制度當中。

第五，關貿總協暨世貿組織的共識決決策方式，¹²³亦強化了強權將其建議草案內容轉換為國際經貿規範的可能性。世貿組織之決策雖是採行共識決，但該等看似平等

註¹²² 曾雅真，「論中國入世之過渡時期紡品特別防衛承諾—以美中紡品限額談判的實踐為例」，頁 76~83。

註¹²³ 有關 WTO 議事規則之內容，請參考 WTO, "Draft Rules of Procedure," DPC/W/142, 1994-09-01; WTO, "Rules of Procedure for Sessions of th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and Meeting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Adopted by the General Council on 31 January 1995," WT/L/28, 1995-02-07; WTO, "Avoidance of Procedural and Institutional Duplication, Decis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Council on 31 January 1995," WT/L/29, 1995-02-07; WTO, "Provisions in the Uruguay Round Final Act Texts relevant to Terms of Reference and Rules of Procedure for the Bodies established Thereunder: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PC/IPL/W/1, 1994-06-21; WTO, "Rules of Procedure for Sessions of th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and Meeting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and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as Approved by the Sub-Committee on 18 November," PC/IPL/9, 1994-11-25; WTO, "Information Regarding Aspects of Notification Procedures and Practices :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TBT/W/188, 1994-10-06。有關對 WTO 決策模式及修改方向的討論，請參考 Claus-Dieter Ehlermann and Lothar Ehring, "Decision-Making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s the Consensus Practic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dequate for Making, Revising and Implementing Rule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8, No.1 (March 2005), pp. 51~75; David E. Skaggs, "How Can Parliamentary Participation in WTO Rule-Making and Democratic Control Be Made More Effective in the WTO?: A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7, No. 3 (September 2004), pp. 655~658; Gregory Shaffer, "Parliamentary Oversight of WTO Rule-Making: The Political, Normative, and Practical Contex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7, No. 3 (September 2004), pp. 629~654; Hunter Nottage and Thomas Sebastian, "Giving Legal Effect to the Results of WTO Trade Negotia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Methods of Changing WTO La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9, No. 4 (December 2006), pp. 989~1016; Robert Wolfe, "Decision-Making and Transparency in the 'Medieval' WTO: Does the Sutherland Report Have the Right Prescrip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8, No. 3 (September 2005), pp. 631~645; Robert Z. Lawrence, "Rulemaking Amidst Growing Diversity: A Club-of-Clubs Approach to WTO Reform and New Issue Selection," Vol. 9, No. 4 (December 2006), pp. 823~835.

的決策方式，實則利於強權主導，因共識決意謂任何一國皆具有否決的權利，任何不利於強權的提案幾乎都可以任何強權的反對而胎死腹中。英國在 1953 年未能藉日本入關之機修改關貿總協的內容，即是肇因於美國的強力反對。而各國時常以達成共識為托詞，在體制外採行非正式之密室諮商與個別談判，反而強化了強權國家個個擊破的聲勢。^⑭此外，共識決的決策方式更是強化了強權的否決地位。關貿總協的締約國與世貿組織各會員抵抗共識決的力度不一，強權通常具有較強的能力，得以承受長時間獨抗群雄的壓力，迫使他國改變立場。爭議性較大的提案，反而給予堅持不讓步國家更大的決策份量，而國家能否堅持該等不妥協的立場，則取決於該國經貿地位的重要性，凡此都給予強權否決他國提案，植入符合強權利益之國際經貿規範的有利地位。

第六，市場擾亂規則即使悖離世貿組織的不歧視原則，但世貿會員仍很難透過世貿原有的修改程序或爭端解決機制，修正權利義務不對稱的市場擾亂條款，該等內在制度的安排，充份發揮議程設定能力的精奧，使對手國的苦楚不會成為決策的一個議題 (agenda)。修改世貿規則本身就是一件困難之事，因為它需要三分之二全體會員的同意；程序性規範的修正，更需透過另訂議定書的方式，並透過會員的批准程序；而世貿規範的解釋，亦需有四分之三會員的多數認可。^⑮中國企圖透過世貿爭端解決機制處理中國 TPSSM 與中國 TTSS 規則的市場擾亂問題，根本緩不濟急。^⑯事實上，問題的關鍵在於，當今的各種國際經貿規範，都是透過締結國際條約的方式完成，而國際條約乃是國家之間的合意結果。理論上各種權利義務均等或者權利義務不對稱的各式國際條約，皆係簽署國在歷經對等談判後所達成的共識，於程序上並無違反國際法之虞。但回顧市場擾亂規則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這些規則均涉及一連串受到扭曲的實質內涵以及正當程序的產出結果，在世貿架構下，符合程序要求但正當性受到質疑的灰色承諾，雖有質疑的空間，卻不存在合法與否的問題，自然難以成為修訂的議題。

因此，強權國家具備創造或扭曲現有「法律概念」，進而阻隔排斥不利強權利益之「法律條款」以及擬定有利強權利益之「法律條款」的能力。相較之下，非強權國家成為強權國操縱議程之受害者，多不具備規劃暨主導「法律概念」的能力，更無力排

註⑭ Amrita Narlikar, "The Politics of Participation: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Round Table: 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64 (2002), p. 175.

註⑮ Hunter Nottage and Thomas Sebastian, "Giving Legal Effect to the Results of WTO Trade Negotia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Methods of Changing WTO Law," pp. 989~1016; see also, article 10 and para.2 and para.3 of article 9, WTO Agreement.

註⑯ 曾雅真，「論中國入世之過渡時期紡品特別防衛承諾—以美中紡品限額談判的實踐為例」，頁 72~73。此外，一般開發中國家更對世貿爭端解決機制抱持很大疑慮，深怕爭端解決裁決一旦具備普世化的拘束力，爭端解決機制可能成為開發國家強迫開發中國家作出讓步的利器，而國家間經貿地位的不對等，更令開發中國家擔心，一旦賦予爭端解決裁決判例法 (case law) 的地位，則會返過頭來束縛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前景，迫使開發中國家作出更多的經貿讓步而一無所獲。See James Smith, "Inequal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 No. 3 (2004), pp. 545~549.

斥不利該國利益之「法律條款」。

目前在世貿組織多哈回合 (Doha Rounds) 多邊談判中，開發中國家似已意識到維護自身權益之重要性，依據議題或利益集結組成不同的談判集團陣營，遲滯已開發國家的提案。巴西、印度為首的 G-20 集團在世貿 2003 年的坎昆 (Cancun) 部長會議，杯葛美國與歐盟聯手提出的農業改革提案，被視為開發中國家抗拒強權國家壓力的代表。¹⁰⁷表面上，強權國家操縱國際經貿法議程並且鑲嵌強權利益之難度似已提高，但強權國家因國際經貿規則所賦予的既得利益是否因此遭到減損，或者長期的國際經貿僵持是否改善了開發中國家的不利地位，有待後續觀察。

陸、結 論

在全球經貿數額與互動日益擴張的時代，國際經貿規範肩負維繫全球經貿秩序的重任。世貿組織的成立與運作，固然為國際經貿規範的發展注入一股新生活水，但市場擾亂概念的法制化歷程，卻凸顯國際經貿規範之發展難以規避強權國家權力操縱的挑戰。

理論上，建立一個不問權力小大只論公理是非的國際法治社會是國際法的最終理想之一，然回顧市場擾亂規則的建構歷程卻發現，強權屢次運用「內生模式」議程設定手段，主導國際經貿趨向，排斥或弱化不利強權條款，限縮對手國經貿利益，擴大強權迴旋空間。而這些單方利於強權國家的條款，均透過國際談判程序而獲得加冕，成為國際經貿法的一環，並為相關之國際社會成員一體遵行。世貿組織創建後，以世貿各項國際條約為建構核心的國際經貿規範，似又為現今國際經貿活動重新鋪設一條平等並有序發展的康莊大道，但迎接光明之際，吾人更有必要冷靜評估該等規範之先天缺陷所可能引致的負面效應。

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國家在國際法下原本享有對等之立基，但權力資源暨經貿地位的不對等差距，卻構成國際經貿規範建構環境中的內在偏差。強權因處於相對有利地位，遂得以利用這些偏差，操縱議程，左右國際經貿規範的發展路徑，成為議程

註¹⁰⁷ 有關世貿多哈談判開發中國家集團與歐美之相互的利益糾葛與政經角力，請參考 Aaditya Mittoo and Arvind Subramanian, "The WTO and the Poorest Countries: the Stark Reality," *World Trade Review*, Vol. 3, No. 3 (2004), pp. 385~407; Dilip K. Das, "Lean Hong Kong Harvest and the Doha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Global Economic Review*, Vol. 35, No. 3 (September 2006), pp. 363~379; Karen Halverson Cross, "King Cotto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Peace Clause': The WTO's US Cotton Subsidies Decis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9, No. 1 (January 2006), pp. 149~195; Michael Friis Jensen and Peter Gibbon, "Africa and the WTO Doha Round: An Overview,"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Vol. 25, No. 1 (2007), pp. 5~24; Rolf J. Langhammer, "China and the G-21: A New North-South Divide in the WTO after Cancun,"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Vol. 10, No. 3 (2005), pp. 339~358; Sungjoon Cho, "A Bridge Too Far: The Fall of the Fifth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 in Cancun and the Future of Trade Constitu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7, No. 2 (2004), pp. 219~244.

設定者。一般國家或在利益驅策下聞雞起舞，或在強權壓制下隱忍不發，只能亦步亦趨不敢造次，成為國際經貿的議程追隨者。等而下之，則是國際經貿規範興革過程的旁觀者，這些國家雖位列國際經貿規範建構的參與者，卻無能力提出利於本國的興革草案，更無從判別他國議程草案對本國利益的負面影響，僅能隨波逐流，在國際經貿規範發展的舞台上扮演龍套角色。

藉議程控制觀點重新梳理市場擾亂的法制化過程，揭露現今國際經貿規範的全貌，不但提供國際社會成員一個重新省思暨觀察的機會，更揭示了一國在參與國際經貿規範建構過程中所應具備的深層認識。除了權力運作外，國家有必要深度認知自身的角色地位，是主導世局的議程設定者，逐利而行的議程追隨者，或是渾渾噩噩不知所終的旁觀者。

* * *

(收件：96年2月6日，接受：96年5月29日；責任校對者：莊家梅)

Market Disrup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Processes of Legalization: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enda-Setting

Yea-Jen Tseng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Financial & Economic Law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It is hard to neglect neither the fact of power competition nor the anarchic charac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scholar researches the context and the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asymmetric dis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enhances the possibility for powerful states to manipulate the agenda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legalization processes, which are therefore constructed in according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international Powers. Formall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s are instituted through bilateral or multilateral dialogue on basis of equality, but in reality, they reflect that under an unbalanced foundation, powerful states maneuvering agendas to strengthen self-interests.

Ob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Disruption rules demonstrates that powerful states could use agenda-setting strategy to fulfill their goal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Powerful states initiated the agenda, presented the draft, legalized certain rules and leave no chance for others the possibility to modify or change the rules in their favor. The strategies, in theory, may not necessarily disobey international order, but in practice, they could disturb the dictum and spirit of international order. Furthermore, when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ceased to be, powerful states could still, through agenda-setting, continue to install the orders into different states or region, thus secure certain privileges of the

powers.

Keywords: market disrup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genda-setting;
WT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legalization

參考文獻

一、各國檔案、關貿總協與世貿組織官方文件

中國商務部，商務部公告 2006 年第 34 號，2006 年 4 月 24 日。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To Cabinet By Menzies," Submission 521, Vol. 20, No. 39, August 11, 1953, <http://www.info.dfat.gov.au/info/historical/HistDocs.nsf/vVolume/411944F37EEF58C7CA256D96000B9381> (viewed 2006/11/30)

Colombian Government, Ministerio de Comercio, Industria Y Turismo, "Decreto Numero 2839 de 2005," 17 Ago 2005.

EU, "EU-China Textile Agreement 10 June 2005," MEMO/05/201, June 12, 2005.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china/intro/memo05_201.htm (viewed 2006/11/30)

GATT, "Arrangement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extiles," December 20, 1973, Instrument No. 135.

GATT, "Arrangements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otton Textile," August 24, 1961, L/1535.

GATT, "Decisions of Seventeenth Session," December 5, 1960, L/1397.

GATT,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1947.

GATT, "Japanese Proposal Regarding Long-Term Arrangement," October 24, 1961. L/1596.

GATT, "Long-Term Arrangement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otton Textiles," October 1, 1962.

GATT, "Summary Record of the Seventeenth Meeting," held at the Sankei Kaikan, Tokyo, December 7, 1959, SR.15/17.

GATT, "United States Proposal for a Long-Term Arrangement," October 23, 1961. L/1592.

GATT, Ad Hoc Committee on Agenda and Intersessional Business, "Report on the Accession of Japan," February 13, 1953. L/76.

GATT, Indian Delegation, "Avoidance of Market Disruption: Statement by Mr. S. T. Swaminathan (India) at the Meeting of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on May 31, 1960," L/1129.

GATT, Japanese Delegation, "Application of Article XXXV to Japan, Statement by the Leader of the Japanese Delegation to the Seventeenth Session on 18 November 1960," November 29, 1960, L/1391.

GATT, Japanese Delegation, "Statement by Japan on 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of Japanese Exports, Restrictions and other Measures Relating to the Problem of Market Disruption," Annex C, May 17, 1960, L/1164.

GATT, Working Party on Avoidance of Market Disruption, "Avoidance of Market Disruption, proposed by the Chairman," June 3, 1960, W. 16/21.

GATT, Working Party on Avoidance of Market Disruption, "Report on the Working Party on Avoidance of Market Disruption," November 18, 1960, L/1374.

-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cerning Trade in Textile and Apparel Products", Nov. 8, 2005. http://www.ustr.gov/assets/World_Regions/North_Asia/China/asset_upload_file91_8344.pdf (accessed 2006/11/30)
- The United States-China Business Council, "Full Text of US-China WTO Market Access Agreement" 2000. <http://www.uschina.org/public/wto/market/> (accessed 2006/11/30)
- Turkish Government, "With Respect to the Import of Certain Textile Products Published in the 3rd Repetition of the Official Gazette Number 25687 dated 31/12/2004," *Belirli Tekstil Ürünleri İthalatında Gözetim ve Korunma Önlemlerine Dair Yönetmelikte Değişiklik Yapılmasına İlişkin Yönetmeli*, available at <http://www.itkib.org.tr>.
-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ummary of US- China Bilateral WTO Agreement, February 2000," <http://www.ogc.doc.gov/ogc/legreg/testimon/106s/daley0411attachment.htm> (viewed 2006/11/30)
- United States, "Congress Report 106-632,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06TH Congress 2d Session,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ay 22, 2000).
- United States, "Normal Trade Relations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ublic Law 106-286, 114 Stat. 881. Oct. 10, 2000.
- United States, "U.S. Trade Act of 1974."
- WTO, "Agreement on Textiles and Clothing," 1995.
- WTO, "Avoidance of Procedural and Institutional Duplication, Decis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Council on January 31 1995," WT/L/29, 1995-02-07.
- WTO, Committee on Safeguards, "Statement by the Head of the Chinese Delegation on the Transitional Review of China to the Committee on Safeguards," G/SG/W/192, 1 November 2002.
- WTO, "Draft Rules of Procedure," DPC/W/142, 1994-09-01.
- WTO, "Information Regarding Aspects of Notification Procedures and Practices: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TBT/W/188, 1994-10-06.
- WTO, "Marrakec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greement)," 1995.
- WTO, "Notific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an Investigation on Imports to Ecuador of Textile Produc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SG/N/16/ECU/1, March 10, 2006.
- WTO, "Notification under Article 16.1 of the Protocol on the Acce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WTO," G/SG/N/16/COL/1/Suppl.1, May 21, 2006.
- WTO, "Protocol of Acce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WTO," WT/L/432, November 23, 2001.
- WTO, "Provisions in the Uruguay Round Final Act Texts relevant to Terms of Reference and Rules of Procedure for the Bodies established Thereunder: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PC/IPL/W/1, 1994-06-21.

WTO, "Report of the Working Party on the Accession of China to the WTO," WT/ACC/CHN/49, October 1, 2001.

WTO, "Rules of Procedure for Sessions of th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and Meeting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Adopted by the General Council on 31 January 1995," WT/L/28, 1995-02-07.

WTO, "Rules of Procedure for Sessions of the Ministerial Conference and Meeting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and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as approved by the Sub-Committee on 18 November," PC/IPL/9, 1994-11-25.

WTO, "Transitional Product-Specific Safeguard on Imports of Textile Products and Clothing into Peru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SG/N/PER/1, G/SG/N/16/PER/1/Suppl.1, May 2, 2005 (previously circulated as document G/SG/67, January 14, 2004).

二、期刊與書籍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國外交 1996 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國外交 2000 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年）。

洪德欽，*法律與政策專題研究*（台北：新學林出版社，2005 年）。

郭秋永，「對峙的權力觀：行爲與結構」，*政治科學論叢*（台北市），第 20 期（2004 年），頁 29~78。

曾雅真，「論中國入世之過渡時期紡品特別防衛承諾－以美中紡品限額談判的實踐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 49 第 3 期（2006 年），頁 51~92。

曾雅真，「論中國入世之過渡時期貨品特別防衛機制－兼論美國 421 市場擾亂特別防衛機制」，*東海大學法學研究*，第 23 期（2005 年），頁 173~221。

薛波主編，*元照英美法辭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年）。

羅昌發，*國際貿易法*（台北：元照出版社，2000 年）。

Abbott, Kenneth W. and Duncan Snidal, "Hard and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3 (2000), pp. 421~456.

Aggarwal, Vinod, "The Unraveling of the Multi-Fiber Arrangement, 1981: An Exam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7, No. 4 (1983), pp. 617~645.

Bachrach, Peter, *Power and Povert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Bronckers, Marco and Reinhard Quick, *New Direction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ssays in Honor of John H. Jackson*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

John M. Brannelly, "The United State's Grant of Permanent Normal Trade Status to China: A Recipe for Tragedy or Transformation?," *Suffolk Transnational Law Review*, Vol. 25, No. 3 (2002), pp. 565~585.

- Bull, Hedley,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 M. Brannelly, John, "The United State's Grant of Permanent Normal Trade Status to China: A Recipe for Tragedy or Transformation?" *Suffolk Transnational Law Review*, Vol. 25, No. 3 (2002), pp. 565~585.
- Byers, Michael, *Custom, Power and the Power of Rul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Carreau, Dominique, Thiebaut Flory et Patrick Juillard, *Droit International Economique*, 4th edition (Paris: L.G. D. J., 1998).
- Cass, Deborah, "The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Judicial Norm-generation as the Engine of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2, No. 1 (2001), pp. 39~75.
- Cho, Sungjoon, "A Bridge Too Far: The Fall of the Fifth WTO Ministerial Conference in Cancun and the Future of Trade Constitu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7, No. 2 (2004), pp. 219~244.
- Cobb, Roger W. and Charles D. Elder, "The Politics of Agenda-Setting: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for Modern Democratic Theor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33, No. 4 (1971), pp. 892~915.
- Cobb, Roger, Jennie-Keith Ross, and Marc Howard Ross, "Agenda Building as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Proces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0, No. 1 (1976), pp. 126~138.
- Cox, Robert W. and Harold K. Jacobson, "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in Robert W. Cox and Harold K. Jacobson, eds., *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Decision Mak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371~436.
- Craven, Matthew, "What Happened to unequal Treaties? the Continuities of Informal Empire,"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4, No. 3/4 (2005), pp. 335~382.
- Cross, Karen Halverson, "King Cotto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Peace Clause': The WTO's US Cotton Subsidies Decis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9, No. 1 (2006), pp. 149~195.
- Curzon, Gerard and Victoria Curzon, "GATT: Traders' Club," in Robert W. Cox and Harold K. Jacobson, eds., *The Anatomy of Influence: Decision making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298~333.
- Das, Dilip K., "Lean Hong Kong Harvest and the Doha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Global Economic Review*, Vol. 35, No. 3 (September 2006), pp. 363~379.
- Diehl, Paul F., *The Politics of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London: Reinner Publishers, 2005).
- Dunoff, Jeffrey L., "Constitutional Conceits: The WTO's 'Constitution' and the Discipline of

- International Law,”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7, No. 3 (2006), pp. 647~675.
- Ehlermann, Claus-Dieter and Lothar Ehring, “Decision-Making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s the Consensus Practic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dequate for Making, Revising and Implementing Rule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8, No. 1 (March 2005), pp. 51~75.
- Firmage, Edward Brown, “The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63, No. 4 (1969), pp. 711~746.
- Friis, Jensen, Michael and Peter Gibbon, “Africa and the WTO Doha Round: An Overview,”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Vol. 25, No. 1 (2007), pp. 5~24.
- Gruber, Lloyd, *Ruling the World: Power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 (Princeton,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Hudec, Robert E., “GATT or GABB?-The Future Design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 80, No. 7 (1971), pp. 1299~1386.
- Jackson, John H.,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onstitution and Jurisprudence* (Lond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8).
- Jackson, John H.,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2).
- Jackson, John H., “The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en Years of the WT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8, No. 1 (2005), pp. 3~15.
- Kahler, Miles, “Conclusion: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Leg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3 (2000), pp. 661~683.
- Keohane, Robert 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9).
- Keohane, Robert O.,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Keylor, William R., *Twentieth-Century World-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4th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Kirgis, Frederic L., Jr., “Specialized Law-making Process,” in Oscar Schachter and Christopher C. Joyner (eds.), *United Nations Legal Ord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47~154.
- Krasner, Stephen 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 Krisch, Nico, “More Equal than the Rest? Hierarchy, Equality and US Predomina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Michaels Byers and Georg Nolte, eds., *United States Hegemon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35~175.
- Krisch, Nico, “International Law in Times of Hegemony: Unequal Power and the Shap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6, No.

- 3 (2005), pp. 369~408.
- Kuijper, Jan P., "The New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The Impact o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Journal of World Trade*, Vol. 29, No. 6 (1995), pp. 49~71.
- Kwakwa, Edward, "Regulat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What Role for the State?" in Michael Byers, ed., *The Rol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27~246.
- Lawrence, Robert Z., "Rulemaking Amidst Growing Diversity: A Club-of-Clubs Approach to WTO Reform and New Issue Selection," Vol. 9, No. 4 (2006), pp. 823~835.
- Livingston, Steven G.,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Agenda-Setting: Reagan and North-South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No. 36, No. 3 (1992), pp. 313~329.
- Langhammer, Rolf J., "China and the G-21: A New North-South Divide in the WTO after Cancun,"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Vol. 10, No. 3 (2005), pp. 339~358.
- Lukes, Steven, *Power: A Radical View* (New York: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974).
- Mansbach, Richard W. and John A. Vasquez, *In Search of Theory: A New Paradigm for Glob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 Mavroidis, Peters C.,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A Commenta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Meinhard, Hilf, "The Role of National Cour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lations,"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8, No. 2 (1997), pp. 321~356.
- Meinhard, Hilf, "Power, Rules and Principles-Which Orientation for WTO/GATT La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4, No. 1 (2001), pp. 123~124.
- Mittoo, Aaditya and Arvind Subramanian, "The WTO and the Poorest Countries: the Stark Reality," *World Trade Review*, Vol. 3, No. 3 (2004), pp. 385~407.
- Narlikar, Amrita, "The Politics of Participation: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Round Table: The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64 (2002), pp. 171~185.
- Nottage, Hunter, and Thomas Sebastian, "Giving Legal Effect to the Results of WTO Trade Negotiations: An Analysis of the Methods of Changing WTO La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9, No. 4 (December 2006), pp. 989~1016.
- Nye, Joseph S., *Power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 From Realism to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Nye, Joseph S.,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 Odell, John S., "Chairing a WTO Negoti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8, No. 2 (2005), pp. 425~448.
- Petersmann, Ernst-Ulrich, "Constitu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Business*, Vol. 17, No. 2/3 (1996), pp. 398~469.

- Petersmann, Ernst-Ulrich, "The WTO Constitution and Human Righ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3, No. 1 (2000), pp. 19~25.
- Rhodes, Sylvia A. & John H. Jackson, "United States Law and China's WTO Accession Proces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2, No. 3 (1999), pp. 497~510.
- Rutherford, Kenneth R., "The Evolution Arms Control Agenda: Implications of the Role of NGOs in Banning Antipersonnel Landmines," *World Politics*, Vol. 53, No. 1 (2000), pp. 74~114.
- Schachter, Oscar, "The Twilight Existence of Nonbonding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1, No. 2 (1977), pp. 296~304.
- Shaffer, Gregory, "Parliamentary Oversight of WTO Rule-Making: The Political, Normative, and Practical Contex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7, No. 3 (2004), pp. 629~654.
- Skaggs, David E., "How Can Parliamentary Participation in WTO Rule-Making and Democratic Control Be Made More Effective in the WTO?: A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7, No. 3 (2004), pp. 655~658.
- Smith, James, "Inequal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 No. 3 (2004), pp. 542~573.
- Spadi, Fabio, "Discriminatory Safeguards in the Light of the Ad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5, No. 2 (2002), pp. 421~443.
- Steinberg, Richard H., "In the Shadow of Law or Power: Consensus-Base Bargaining and Outcomes in the GATT/W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2 (2002), pp. 339~374.
- Steinberg, Richard H. and Jonathan N. Zasllof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0, No. 1 (2006), pp. 64~87.
- Tiefer, Charles, "Sino 301: How Congress Can Effectively Review Relations with China After WTO Accession,"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34, No. 1 (1999), pp. 55~93.
- Trachtman, Joel P., "The Constitution of WTO,"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7, No. 3 (2006), pp. 623~646.
- Tsebelis, George, "The Power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s a Conditional Agenda Set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1 (1994), pp. 128~142.
- Waltz, Kenneth,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 Wight, Martin, *Power Politics*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78).
- Williams, Brett G., "The Influence and Lack of Influence of Principles in the Negotiation for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eorg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 Law Review*, Vol. 33, No. 3/4 (2001), pp. 791~847.
- Wolfe, Robert, "Decision-Making and Transparency in the 'Medieval' WTO: Does the Sutherland Report have the Right Prescrip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8, No. 3 (September 2005), pp. 631~645.
- Yasuaki, Onuma (大沼保昭), "International Law in and with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Func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4, No. 1 (2003), pp. 105~139.
- Yoffie, David B.,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ction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4 (1981), pp. 569~599.